

【研究論著】 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006_17(1).0002

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價值——
以清書、清語與滿漢關係為中心
Manchu Script,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Manchu-Han Relationship: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Value of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吳政緯

Cheng-wei WU*

關鍵詞：燕行文獻、燕行錄、清史、滿洲特性、《燕行備覽》

Keywords: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Yōnhaengnok, The Qing History, Manchuness, *Yeonhaeng Bilam*

2019年6月4日收稿，2019年10月14日修訂完成，2019年10月16日通過刊登。

§ 本文初稿以〈從十七、十八世紀燕行文獻看清朝的滿洲特性〉為題，2018年1月13日發表於國立政治大學韓國文化教育中心主辦的「第五屆國際學術會議——在地韓國學專家養成之實務與展望——」。後經大幅修改，2018年10月26日提交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人類學門，作為博士生獎助的年度成果報告。兩次報告，蒙林麗月、林富士、李貞德、戴麗娟、陳慶智、陳韻如諸位老師指正，以及學兄鹿智鈞、陳重方、陳禹仲的寶貴意見。再經修訂，投稿之後又承蒙審查人斧正，謹申謝忱。

* 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摘要

晚近學界益發關心燕行文獻，相關研究成果迭出。與此同時，部分學者指出學界欠缺對於史料本身的研究，呼籲系統地整理燕行文獻，揭示史料可能產生的問題。本文旨在透過具體的個案，探討、反省燕行文獻的結構，呈現其特性與問題，選定的主題是朝鮮使者眼中的清書、清語與滿漢關係。朝鮮使者是少數能夠寓居北京，進入紫禁城謁見清朝皇帝的特殊群體。本文梳理燕行文獻關於「滿洲」的記述，依序討論朝鮮知識人如何描寫滿洲語文、滿洲風俗、滿漢差異，以及研究者應如何理解、詮釋朝鮮燕行使對於各種滿洲特性的觀察。

朝鮮使者意識到，滿洲語文是清朝的特色，這不僅是官方通行的國語，同時在朝貢過程中發揮保密防諜的效果。朝鮮使者對滿洲人的記述雖然珍貴，但某些見聞必須考量歷史、文化的因素，如朝鮮知識人筆下的「滿漢關係」往往先入為主地認定滿人欺壓漢人，中國史家利用朝鮮史料必須有所警覺。其次，清朝皇帝與滿洲人面對朝鮮使者時，之所以樂於說滿洲話，必須考慮到旗人不乏「朝鮮人子孫」。最後，本文透過「史實」、「文獻」兩個層次，釐清應用燕行文獻探討滿洲特性時，存在哪些問題。筆者認為域外文獻不應僅止於中外關係史的話題，其中的問題正有待中國史家積極涉入。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cademic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interested in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Yānxíng Wénxiàn 燕行文獻) that leads to an outpouring of new research. Some scholars have already pointed out that the lack of research on these documents and called for a classification of them to reveal some possible issues. This article aims to concretize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aise issues of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by exploring and reflecting on its structure through specific cases. I will discuss the Manchu alphabet, the Manchu language, and the Manchu-Han rela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Manchuness of the Qing Dynasty during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y. My analysis is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nd followed by a brief summary and reflection. The first part attempts to investigate the Chosŏn intellectuals' depictions of the Manchu language, the Manchu customs,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Manchu and Han cultures. The second part aims at suggesting some possible ways of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observations of the Manchuness.

This paper stresses that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were aware of the use of the Manchu language in the Qing court that differed from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Ming court. As an iconic feature of the Qing dynasty,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realized that the Manchu language not only served as an official langua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tool for concealing information from hostile spies of some tributary states.

When analyzing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observations on the Manchu culture,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factors into account. For instance, the Chosŏn intellectuals sometimes perceiv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Manchus and the Han as unidirectional oppression. Additionally, considering that some Manchus were descendants of the Chosŏn, Qing emperors and officials were more than willing to use the Manchu language when dealing with the Chosŏn diplomatic envoys. In a word, in order to resolv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historical facts and secondary literature, it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further investigate and critically analyze the descriptions and observations in the China Mission Record.

壹、前言

自二〇〇一年韓國東國大學推出一百冊《燕行錄全集》後，這批由朝鮮燕行使撰寫的日記、報告書引起眾多中國史家密切關注。¹隨著《燕行錄》研究成果不斷推陳出新，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或提醒或警告，當前學界缺乏針對「燕行文獻」²本身的基礎研究，在版本目錄、作者繫年，以及燕行文獻整體的記述特性上，仍有不少重要問題未能解決。³不過此類意見多為一種呼籲、提倡，具體的個案研究極其少見。本文嘗試透過明確的課題，盡量完整呈現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題，並提出可能的解決辦法。

本文同意先行研究的意見，針對燕行文獻本身的研究仍有極大的拓展空間。研究者若能帶著明確的問題意識，藉此呈現燕行文獻在幾種記述上的特性，逐步累積成果，大有助於釐清利用燕行文獻的疑慮，實質推進此類史料的基礎研究。本文選定的主題是燕行文獻中關於清書、清語、滿漢

- 1 關於燕行文獻的意義，多強調其補充中國史料不足，並能從域外反省傳統中國史敘事，該史料整理的情況以及研究概況請參閱：李元淳（이원순）：〈赴京使行的文化史的意義（中譯：朝鮮赴京使行在文化史上的意義）〉，《朝鮮時代史論集：안(한국)과밖(세계)의만남의역사》（서울:느티나무, 1993年），頁53-74。葛兆光：〈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8年3月），頁2-9。崔韶子（최소자）：〈「燕行錄」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칭사연구》，第30輯（2008年10月），頁1-11。裴英姬：〈《燕行錄》의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219-255。
- 2 本文使用「燕行文獻」，而盡量避免「燕行錄」一詞，是因為「燕行錄」通常指朝鮮知識人在中國旅行時的見聞記錄。但事實是他們歸國後仍有不少記述，以及相關文獻如行前指南《燕行備覽》（詳後），這些有意無意間都可能被「燕行錄」一詞排除在外，因此用性質較寬泛的「燕行文獻」統稱，特此說明。
- 3 漆永祥：〈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10年9月），頁60-65。金榮鎮（김영진）：〈燕行錄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법에 대한 試論（中譯：試論燕行錄的系統性整理及研究方法）〉，《大東漢文學》，第34輯（2011年），頁65-91。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年），頁423。林基中：〈燕行歌辭와 燕行錄의 相互原典性과 流行樣式（中譯：燕行歌辭與燕行錄的相互原典性與流行樣式）〉，收入林基中、崔韶子（編）：《연행록의 세계》（서울:景仁文化社，2015年），頁1-42。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頁234-269。

關係的記述。目前的清史學者尚未注意到燕行文獻中關於此議題的史料，透過介紹、分疏這一批文本，相信也能起到一定的助益。更重要的是，本文擬透過與清代史料互讀，檢視文獻的價值與問題，具體呈現燕行文獻有待克服的問題。

旗人以「非漢族群」入主中原，晚近的研究強調維持清朝治世的原因，除滿人漢化、信奉儒學等「漢元素」外，尚須衡量清朝皇帝有意識地提倡「滿洲特性」（Manchuness）。⁴相較於研究者對滿洲、旗人的關心，鮮見從漢人角度的出發的研究成果。⁵深入漢人眼中的滿洲，以及「滿漢關係」等議題，史料不足始終是一大難題。民國肇建，中國第一代的明清史家如孟森（1868-1938）猜疑明清史料的真實性，在課堂上表明《明史》不能遂為信史，⁶《清實錄》則盡經改造，不復原本面目。⁷在這樣的背景下，孟森將目光投向朝鮮史料，尤其是《朝鮮王朝實錄》，藉此撰寫代表作

-
- 4 Pamela Kyle Crossley,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Mark C. Elliott,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年）。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賈建飛（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綜合性的研究討論請參見王成勉：〈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頁57-81。歐立德（Mark C. Elliott）：〈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季號），頁1-18。杉山清彥：〈大清帝國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第10號（2008年3月），頁347-372。葉高樹：〈「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頁195-218。必須說明的是，儘管這些研究成果被學界視為「新清史」，但內中仍有分歧，例如日本學界處理滿洲議題的脈絡與美國學界不同，但總的來說可以發現近幾年學界關心滿洲史、清朝的滿洲元素的面向。
 - 5 相關研究的重心多是清末，如路康樂（Edward J. M. Rhoads）：《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王琴、劉潤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柯嬌燕（Pamela Kyle Crossley）：《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陳兆肆、董建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 6 孟森：〈明史在史學上之位置〉，收入氏著：《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5。
 - 7 孟森指出清朝官方「務使祖宗所為不可法之事，一一諱飾淨盡，不留痕跡於《實錄》中，而改《實錄》一事，遂為清世日用飲食之恆事。」見孟森：〈讀《清實錄》商榷〉，收入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686。

《明元清系通紀》，⁸開明清史家大量利用域外文獻的先河。

時至今日，相較於孟森僅能依據《朝鮮王朝實錄》等文獻，中國的明清史家在《燕行錄全集》出版後，具備更好的條件探討相關課題。以滿漢關係為例，前人研究多關注明末清初、清末民初的狀況，⁹盛清時期的成果極為罕見。畢竟官方意識形態控制在清代中葉最為穩固，清廷透過御纂書籍、禁書政策，宣傳華夷一家、滿漢一體的論述，風行草偃。這直接導致當代史家能夠運用的證據有限，王汎森（1958-）曾指出，除晚清的著述外，清代史料論及種族問題的文字非常罕見，一般人對此問題避之唯恐不及，幾乎找不到任何直接的材料。¹⁰王汎森轉而將目光投向朝鮮人著述《燕行錄》，認為從田野調查的角度閱讀，能夠大致解答這個「在清代中國既敏感而又充滿忌諱的問題」。¹¹

本文同樣關心盛清時期漢人眼中的滿漢關係，但強調研究者利用朝鮮史料，須先展開針對史料本身的研究，釐清該文獻的性質與可能發生的問題。目前中朝關係史學者尚未深入燕行文獻所見的清書、清語，乃至滿漢關係，也未能反省此類記述的問題。至於整理、分析朝鮮使者如何逐步觀察、記錄滿文、滿語、滿人的相關研究，同樣付之闕如。¹²前人研究的要點是重建滿洲風俗的史實、討論旗人形象的演變。¹³例如梨花女子大學鄭惠仲

8 「就現行世十六冊及筆者所見待刊原稿，其中十分之七八是引據李朝實錄。」吳相湘：〈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頁157。

9 王宇：〈路康樂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828）》評介兼論晚清滿漢關係史研究〉，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第11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14年），頁444-456。

10 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現象——禁書復出及其意義〉，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本）》（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4年），頁630。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本）》，頁649（這篇文章初次發表於2008年的《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就筆者所知，王汎森是首位指出應利用燕行文獻研究滿漢關係的學者。

11 王汎森：〈從東亞交涉史料看中國〉，收入氏著：《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修訂本）》，頁645-651。

12 本文使用清書、清語，對應的是滿文、滿語。如本文以下徵引的史料所示，清書、清語是朝鮮文獻慣常的用法。

13 吳紹鈞：〈《熱河日記》與滿族民俗〉，《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

特別關心滿洲女性，但她的旨趣是與明清性別史的研究成果對話，指出朝鮮燕行使目睹漢人女性在公開場所露臉，且滿洲女性積極地與男性對話，這些中下層的平民女性與過去「大門不出、二門不邁」的認知大不相同。¹⁴

本文旨在透過朝鮮使者關於滿洲特性的記述，審視朝鮮使者是否、如何注意到清書、清語、滿漢關係，及以此類記述反映出的種種問題。具體的討論將透過燕行文獻，考察滿漢之間是否存在彼此區別的意識，以及燕行文獻是否適合研究滿漢關係。本文以下擬先從不同層次梳理清書、清語如何進入朝鮮使者的視界。其次，本文以性質接近「中國旅行指南」的《燕行備覽》為例，考辨燕行文獻的真偽。最後析論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題，及可能的克服方法。

貳、 朝鮮使者眼中的清書、清語： 滿洲如何進入朝鮮的視界

回顧朝鮮與大明交往的歲月，漢字始終是維繫雙方的重要元素。活躍於嘉靖年間（1522-1566）的朝鮮官員魚叔權曾編纂《攷事撮要》，詳載事大文書的各種類型及相應的格式。¹⁵該書數次提及明朝皇帝、官員對朝鮮事大文書的讚譽，如「表箋章奏，與夫行移吏文，悉遵體式」，或是「朝鮮國文字明白」。魚氏曾七次出使中國，他更以親身經歷指出，明朝官員在

（1984年7月），頁106-115。汪銀峰、姚曉娟：〈朝鮮朝燕行使筆下的滿語〉，《滿語研究》，第2期（2014年12月），頁24-28。徐東日：〈試論朝鮮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滿族人形象〉，《東疆學刊》，第28卷第4期（2011年10月），頁1-8。王桂東：〈《熱河日記》與清代民族問題研究二題〉，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第11輯，頁224-247。

14 鄭惠仲（정혜중）：〈18세기 조선지식인의 청국 여성관——김창업（金昌業）과 박지원（朴趾源）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中譯：18世紀朝鮮知識人的清國女性觀——以金昌業、朴趾源的紀錄為中心）〉，《중국학보》，第73卷（2015年），頁377-397。此外，關於韓國的滿洲史研究（Manchu Studies），高麗大學崔溶澈指出，儘管少數單位如高麗大學已有長期發展的規劃，但迄今專家仍不多，也缺乏全面的研究，請見Yong-chul Choe, “Manchu Studies in Korea,”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3 (Mar., 2012), pp. 89-101.

15 魚叔權：《攷事撮要》，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3輯，子部第10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363-490。

閱讀朝鮮的表文後，對朝鮮譯官說道：「不須喋喋，我見此文，已知首尾」。¹⁶相較琉球國的奏疏「詞意多疵，殆不成章」，¹⁷魚叔權顯然自豪於朝鮮的漢文素養。

相較於明朝，朝鮮對於近鄰的旗人並不陌生，不論是建州女真時期，或是後來的金國¹⁸、大清國，雙方來往密切。¹⁹在文化上，朝鮮遵行漢文化，乃傲視諸國的小中華，對於入關前尚處於部落時代，且不特別學習漢文化的滿洲，並無好感。不僅如此，朝鮮更曾經發兵征伐女真部落。朝鮮世祖（李瑋，1417-1468）即位後，揮軍北伐，擊敗北方的不順民族，將此次功業結為文字，刊行《北征錄》。²⁰由此，朝鮮眼中的明清鼎革不啻天翻地覆的劇變。

大清入主中原後，朝鮮使者眼前的中國呈現不一樣的風景。清書、清語等具滿洲色彩的表徵，對朝鮮貢使而言是有別過往的異樣存在。儘管絕大部分的朝鮮知識人不諳漢語會話，但皆能書寫漢字，且歌且賦。不倚仗朝鮮翻譯官，朝鮮使者亦能透過筆談的方式，與中國官員交流。更遑論本就以漢字撰寫的官方文書，對朝鮮燕行使完全不是問題。然而這種模式不適用與旗人的交往，對朝鮮方面而言，清書、清語尚是陌生的存在。

一六六一年，順治帝（1638-1661）駕崩，朝鮮使節趙珩（1606-1679）正在北京。順治帝去世前幾日，使節團留宿清朝接待外賓的會同館，當時

16 這三句引文均出自魚叔權：《裨官雜記》，收入《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1輯第8冊（臺北：東方文化，1971年），頁61-62。

17 魚叔權：《裨官雜記》，《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1輯第8冊，頁11。

18 關於先清時期的國號為「金」、「後金」的問題，最近的研究已透過數量豐富的證據說明，國號並非「後金」，見盧正恆、黃一農：〈先清時期國號新考〉，《文史哲》，第1期（2014年1月），頁66-74。

19 張存武曾表示：「滿清在順治元年入關前已與朝鮮關係很密切」。1644年之前，雙方來往的文書檔案，請參閱張存武、葉泉宏（編）：《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年）。關於清入關前與朝鮮的關係，另請參閱劉家駒：《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陳捷先：〈清太祖時期滿洲與朝鮮關係考〉，收入刁書仁、衣興國（編）：《中朝關係史研究論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274-298。

20 朝鮮世祖（命編）：《北征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李克堪序刊本，1461年）。

「館門比前牢鎖，外人絕不得與相通」。²¹後來得知皇帝殞天，以及康熙帝（1654-1722）即將登極的消息，一行人於是進參陳賀。當他們至皇極殿前行禮結束後，出天安門，跪聽詔書，趙珩明白表示：「清人禮官讀清書，漢人禮官讀漢書。」²²朝鮮使者已注意到詔書有滿文、漢文之別。

不僅是皇帝駕崩的特殊時刻，宣讀詔書有滿漢之別，朝鮮使者在燕行途中亦屢屢提及清書、清語。一六八二年出使的韓泰東（1646-1687）、韓祉（1675-?）注意到沿路「豎碑衆多，或清書或楷字」。²³韓泰東等人自然不解滿文，他表示「或清書或楷字」，是因為他唯識得楷字，而無法曉解的文字則是清書。此類例子甚夥，一七一二年出使的金昌業（1658-1721）也留意到碑刻，他參訪瀋陽近郊的實勝寺時，能辨識一碑上的題字，但對背面的清書，以及其他滿文，均不可解也。²⁴因此金昌業雖能指認「皇帝所書碑，左隸書，右清書也」，²⁵卻不代表他懂滿文。朝鮮人對清書的注意，是因為它的特異。

一、朝堂之上

按照慣例，朝鮮使節團入住會同館後，擇日學習宮廷禮儀，即搭配各種口號的應對進退。進宮朝參是朝鮮使者最重要的任務，他們有機會親睹皇顏。一行人會由負責朝堂禮儀秩序的序班帶路，如萬曆二年（1574）出使的趙憲（1544-1592），到指定的位置後，指揮整個典禮的司儀「鳴贊」會用漢語提醒，次序通常是唱跪、磕頭，再引去皇帝面前。²⁶

清承明制，以一六九〇年的徐文重（1634-1709）為例，使節團代表同樣前往鴻臚寺演儀，寺官、使節站妥定位後，寺官「以清語唱一跪三叩

21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0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頁228。

22 趙珩：《翠屏公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0冊，頁229-230。

23 韓泰東、韓祉：《兩世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9冊，頁319。

24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1冊，頁343。

25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133。

26 趙憲：《朝天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冊，頁222。

頭，如是者三」，²⁷朝鮮使節依令行事。儘管如此，朝鮮使者終究不解滿語，於是在朝堂上如金昌業，當「臚唱清語」時，也是倚靠隨行的翻譯官「以我音傳之」。²⁸這種對滿洲語文的實際需要，並沒有導致朝鮮使臣普遍學習滿洲文，他們陌生如舊。乾隆四十八年（1783），李田秀（1759-？）隨使節團前往瀋陽，在場同樣有維持禮儀秩序的官員，然後「高聲唱臚而皆用清語」，當時也是因為「（朝鮮）通官立班側，階前者唱臚後，以我語翻說」，²⁹方得行禮如儀。

不僅朝堂典禮使用滿語，明代的朝鮮使臣魚叔權自豪的漢字奏疏，也代以滿文撰寫的官方文書。眾所周知，朝鮮的事大表箋全是漢字，因此朝鮮、明朝官員能夠直接筆談，通行文書堪稱「書同文」。³⁰早在一六四一年，朝鮮王子昭顯世子李湮（1612-1645）在瀋陽坐質時，已留意到「此處近日事，清書記錄，而方令文字翻書，明日令善寫者，依此謄書送於本國」。³¹當時清人尚未入關，在瀋陽的宮廷內部，流通文書全係滿文。

滿洲入主中原，內部文書雖納入漢文，仍保留滿洲傳統。內閣設有侍讀學士八人，職掌係「收發本章，總稽繙譯」，³²其中漢本房「專司繙譯清、漢文」。³³參照朝鮮使者的觀察，金昌業強調「此邦之規，凡文書盡以清書反譯，然後奏于皇帝」，³⁴指出清朝官方會將各式文書翻譯成滿文，然後上奏皇帝。一七一二年出使的閔鎮遠（1664-1736）解釋得更為清楚，當時表文已呈送禮部，卻沒有被告知明確的入啓時程，於是委由朝鮮譯官詢問。答案是朝鮮咨文在禮部官員檢視後，「移送內閣，以清書翻譯入啓，

27 徐文重：《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4冊，頁196。

28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1冊，頁441。

29 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頁161。

30 朝鮮外交文書的樣式與體例，請參見何新華：〈清代中國與朝鮮往來朝貢文書研究〉，收入氏著：《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頁54-129。

31 朝鮮世子侍講院：《瀋陽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25冊，頁574。

32 〔清〕允禩等撰：〈內閣〉，《欽定大清會典》，卷2，《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頁36。

33 〔清〕紀昀等撰：〈內閣上〉，《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2，頁41。

34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23。

遲速姑未可定」。³⁵乾隆年間的朝鮮使臣李埰（1737-1795）亦指出，京外奏本，若是撰以滿文，可直接進奏，漢文、蒙文則必須翻譯後送內閣。³⁶揭示內閣經手的文書必須翻成滿文，不惟中國文書，「域外文書」亦然。³⁷

二、宮廷語言

「滿洲氣息」之濃厚，不僅見諸燕行沿路的碑刻、匾額，以及朝貢程序的官方文書，朝鮮使者寓居北京後、在紫禁城進謁期間，更是處處皆然。例如，金昌業在紫禁城時，突有清朝官員至，示以小紙提醒行程，上頭皆是清書。³⁸康熙四十三年（1704），李頤命（1658-1722）所見會同館提督出示的小紙，同樣是「清字小紙」。³⁹

一個值得討論的現象是，朝鮮使者認為在清朝宮廷裡頭的人全說滿洲話。乾隆六年（1741），朝鮮國王與兩位曾經奉使清朝的官員有過一次問答，乾隆二年（1737）擔任正使的李棟表示：「殿內則皆用清語。」乾隆三年（1738）的進賀使金在魯（1682-1759）則附和道：「殿上酬酢，皆是清語，故仕宦者，皆習清語云矣」。⁴⁰他們皆曾親臨中土，入宮奉表，見聞頗具份量。

35 閔鎮遠：《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6冊，頁285。

36 李埰：《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3冊，頁133。

37 關於清朝公文行政的翻譯制度，及相關的社會現象，請參閱葉高樹：〈彙纂繙譯 用備觀覽：譯書事業與文化溝通〉，收入氏著：《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年），頁53-99。葉高樹：〈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翻譯教育〉，《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2年12月），頁71-154。葉高樹：〈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3年6月），頁47-136。葉高樹：〈繙譯考試與清朝旗人的入仕選擇〉，《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2期（2014年12月），頁95-132。葉高樹：〈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收入汪榮祖（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4年），頁133-163。林士鉉：〈統攝百辟：旗人與清代內閣及其文書〉，收入旗人與國家制度工作坊（編）：《「參漢酌金」的再思考：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年），頁25-82。關於清代內閣滿文檔案的簡要介紹，請參閱吳元豐：〈清代內閣滿文檔案述略〉，《滿語研究》，第1期（1997年5月），頁55-61。

38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106。

39 李頤命：《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4冊，頁119。

40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承政院日記》（서울：大韓民國文教部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年），第51冊，頁30。

乾隆五十七年（1712）啟程的崔德中同樣指出清朝宮廷「庫中諸文書，皆寫清書」，更強調「宮內之人，皆用清語」。⁴¹皇宮內所有成員，皆說滿洲話，不免過份渲染。不過這三個例子也能理解為，一位完全不解滿洲語文、熟習漢字的朝鮮知識人，加上無法聽懂漢語，在他經歷簡短但隆重的朝儀後，確實可能放大人生僅見的滿洲特色，成為「宮內之人，皆用清語」的斷語。

混雜真實的見聞，以及部分誇大的描繪，清朝宮廷呈現出與大明不同的風格。明代的朝鮮使節通常會讚嘆、共鳴大明的漢文化，例如萬曆二十九年（1601）的李安訥（1571-1637），當他進入北京城時，感嘆道：「詩書禮樂周風俗，道德皇王漢祖宗。萬曆太平端拱日，廣庭駕鸞綴夔龍。」⁴²此類文字不復見諸清代燕行使之手，他們親睹的中國是「皇帝以清書下旨意」，⁴³或「漢人仕宦則輒學習清語，蓋公會則用清語，奏御文字皆繹以清語」，⁴⁴均與周風俗、漢祖宗相去甚遠。

三、滿洲之道與保密手段

朝鮮使臣對於此類「滿洲元素」自有見解，尤其滿洲人以異族入中國，卻仍保持舊有習俗，維持滿洲之道，有違「入中國則中國之」的變通處置。朝鮮知識人認為清語、清書是與中國外交最實用的工具。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使大清的徐浩修（1736-1799）歸國覆命，與朝鮮正祖（1752-1800）對談時，他直言：「事大中最緊切即清語」，⁴⁵也就是與中國官方交往，最重要的是滿洲語文。

所謂「最緊切即清語」的第一個涵義，係前述所列朝鮮知識人感到陌生又殊異的清書、清語，在朝貢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朝鮮使臣意識到，清書、清語也是提防不解滿洲語文者的利器。在徐浩修出使前

41 崔德中：《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0冊，頁85。

42 李安訥：《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5冊，頁188。

43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啓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8冊，頁160。

44 徐長輔：《薊山紀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66冊，頁569。

45 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2冊，頁271。

十二年，一七七八年，朝鮮最高行政首長領議政金尚喆（1712-1791）曾與朝鮮正祖有過一次談話。當時使節團甫歸國不久，對話全圍繞著使行事務；朝鮮正祖問道：「清學緊於漢學耶？」詢及滿洲話是否比漢語重要。儘管金尚喆表示：「通語之際，漢學為主。彼人酬酢，皆用漢語矣」顯見朝鮮使者與中國官員溝通時，主要仍是漢語為主，這應該包含朝鮮漢譯官，以及兩國官員間的筆談。值得注意的是，在旁的徐命善（1728-1791）提醒道：「聞彼人於酬酢要緊處，皆用清語云」即在重要的關鍵處，清朝官方會以滿洲語文溝通。⁴⁶

徐命善的發言引領吾人從另一個面向審視「滿洲語文」對朝鮮的意義。一七八三年奉使瀋陽的李田秀，細緻地說明清語的保密、實用、緊要性，他表示（底線為作者所加，以下同）：

清人生長中國者，自兒時皆以漢語成習，而國法為其不忘本俗，故自皇帝以下，無不學清語。至於奏御之文，皆翻清而進之。宣表之類，亦翻清而讀之。我人在側之時，如有機密不欲泄者，則又皆以清語相話。清語之為重如是，故我國近亦多能語者，今行中玄啓百、尹春咸皆善說之，玄則再與皇帝打話。⁴⁷

李田秀認為，乾隆晚期的旗人生於中國，自小學習漢語，清朝官方為不忘本俗，於是從皇帝以下，無不學習清語。最重要的是，當朝鮮人在清朝官員旁邊時，為保密防諜，他們會換用滿洲話溝通。其次，李田秀表示朝鮮翻譯官如中玄啓百、尹春咸皆善清語，遂能與皇帝對話。朝鮮譯官通常是中人出身，擔任正使、副使、書狀官的士人，以及隨行的子弟軍官大抵是兩班出身，並不通滿文，此等工作都委於譯官。

同樣的情況出現在軍事機密方面，乾隆皇帝（1711-1799）曾幾次提醒滿洲將領，應以滿文撰寫奏摺。例如乾隆十一年（1746）下諭旨給時任西寧辦理青海番子事務之副都統的莽古賚（?-1785）、駐藏辦事之副都統的

46 該次談話出自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正祖實錄》，卷6，《朝鮮王朝實錄》，第45冊（서울: 國史編纂委員會, 1958年），頁65，「正祖二年九月丙辰」條。

47 李田秀：《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頁390-391。

傅清（?-1750），明言：

爾等陳奏事件，莽古賚每次俱用漢摺，傅清亦間用漢摺。〔……〕。今莽古賚、傅清係滿洲大臣，且係辦理蒙古、唐古忒事務，所有事件理應用清字奏摺。伊等竟仿效外省大臣用漢字奏摺，殊屬非是。著飭行，嗣後奏事俱著繕寫清字奏摺，並寄諭眾佛保知之。⁴⁸

乾隆十九年（1754）亦云：「所有關係軍機事件，俱用清字具奏。」⁴⁹顯然不論是朝堂上的討論，或事涉軍機的情報，清朝官方有意識地利用滿洲語文，一定程度起到保密防諜的效果。

至此，本文大抵梳理滿文、滿語如何在明清鼎革之後，如何進入朝鮮使者的視界。他們特別留意眼前不可解的「有字天書」，使節團的上層官員卻從未竭力克服語言障礙，學習清書、清語，即便他們均承認滿洲語文遍佈四處。換句話說，此類觀察清書、清語的文字大多出自不通漢語口說、不懂滿文的朝鮮士人。再者，滿洲語文不僅是一種傳統習俗，對於朝鮮貢使而言，這同時也是一種保密語言。揆諸朝鮮知識人與中國交往的歷史，間或有熟習漢語者，但掌握滿洲語文者，即使存在這樣的案例，也絕對不是普遍的現象。以下，本文將基於上述關於滿洲的觀察，在確立朝鮮人所見的滿洲意象後，析論朝鮮使節眼中的「滿漢關係」。

參、想像與真實之間：漢人或朝鮮人的滿漢之爭？

為了辨析燕行文獻關於「滿漢」的史料，本文此前探究朝鮮使者是在甚麼樣的情況下注意清書、清語。朝鮮使者涉及滿漢關係的記錄，時常牽涉到清書、清語。分析滿漢關係的記述，必須盡量涵括相關記錄，才能在

48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258，頁334，「乾隆十一年二月上」條。

49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465，頁1027，「乾隆十九年五月下」條。

各自的文脈中掌握朝鮮使者的用意與所指。

如前所述，朝鮮對滿洲無甚好感，文化上獨尊中國，軍事上又曾出師討伐，加上大明協助平定壬辰倭亂的恩情，使得朝鮮在一六四四年以後思念明朝的文化風潮久盛不衰。即便清朝日漸富強，朝鮮的敵意依舊。直到一七八〇年，朝鮮使者朴趾源（1737-1805）仍表示朝鮮國內的讀書人「為中國復仇刷恥之心，豈可一日而忘之哉！我東士大夫之為《春秋》尊攘之論者，磊落相望，百年如一日，可謂盛矣」⁵⁰可為明證。

朴趾源筆下的朝鮮士大夫，高唱攘夷之義，自甲申以降，百年如一日。他們特別注意旗人的種族特徵，多所揣摩他們的心理性格，不乏負面、扭曲之詞。例如李宜顯（1669-1745）認為：「清人大抵豐偉長大，而間有面目極可憎者，羶臭每多襲人，言辭舉止，全無溫遜底氣象。」⁵¹強調旗人的體型高大，有些則面目醜惡，且體臭濃郁，可說是毫無文化的形象。相形之下，漢人則「外貌亦稍端正」，⁵²顯然評價較旗人好。

朝鮮使者區隔滿漢的標準繁多，康熙五十九年（1720）出使的李器之（1690-1722）指出「大抵清人多質，漢人多詐」，⁵³表示旗人較質樸，而漢人狡詐。然而外貌上豐偉，面目是否可憎，其實極為主觀。再者，燕行使大多處在移動狀態，結交中國朋友時間不夠充裕，滿洲與漢人「誰質誰詐」的斷語，也應有所保留。重點是此類設問其實都映照出朝鮮人始終認定旗人、漢人之間異多於同。

滿漢之間自然不是樣樣趨同，例如婚喪喜慶各有辦法。洪大容（1731-1783）燕行期間曾聽聞，八旗漢軍的嫁娶儀式，與八旗滿洲不同，這是舉目立見的文化差異。⁵⁴不過這種風俗上的差別，卻也可能成為朝鮮知識人的疑惑：他們意識到滿洲與漢人的差異，不禁追問何以「清人既尊尚中土之

50 朴趾源：〈駟汎隨筆〉，《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年），卷2，頁61。

51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5冊，頁460。

52 李宜顯：《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5冊，頁461。

53 李器之：《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13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年），頁113。

54 洪大容：《滄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頁221。

儀文，而不變滿洲之舊俗？」⁵⁵他們的價值以漢文、中國（明朝）為主體，自然認為漢人不學習滿洲話，不是因為能力有限，而是不樂為也。⁵⁶既然認定滿漢有別，便視清廷的種種作為深含維持舊俗的用心，如崔德中云：

宮內之人，皆用清語，第皇帝雖知一國內兩音兩書之難行，若捨清全漢，則他日敗出之後，更行必難。故守其本而不禁漢，自然年久而成習，人多行清音書，其人之遠慮可知。⁵⁷

十七、十八世紀的朝鮮國王、官員認為，清人可能因為內亂、蒙古叛變，導致敗亡出走。⁵⁸朝鮮方面的解釋是清朝隨時有傾覆之危，維護滿洲風俗是保留後路。在崔德中的認知裡，旗人一直戒備漢人，而這正是不放棄清語的原因。這種「滿漢分離」、滿人控制漢人、滿人提防漢人的觀點，一直是十七、十八世紀朝鮮知識人理解清代中國的重要概念。

姑且不論是否符合史實，揆諸朝鮮燕行使的中國見聞，滿漢分離的敘事方式極為常見。雍正二年（1724）的權以鎮（1668-1734）提及：

康熙之末，紀綱已壞，〔……〕，漢人與清人常立黨，相惡相憎，康熙雖調停，而漢人見我人，全談清主之惡，見清人來則默而跑去云。⁵⁹

再參以乾隆四十二年（1777）的李埤，他的說法更凸顯這種意識：

蓋中州陸沉，今幾百年，（明朝）王澤已竭，（明）遺民盡亡，雖未知其盡有思漢之心，而被髮左衽，漢人尚以為恥。且清人之待漢人，反不如奴隸及諸國之人，收用之典、用權之道，與清人

55 朴趾源：〈審勢編〉，《熱河日記》，卷4，頁219。

56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1冊，頁289。

57 崔德中：《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0冊，頁85-86。

58 朝鮮方面的「寧古塔敗歸說」請參閱李花子：〈17、18世紀朝鮮對清的危機意識及其克服〉，收入氏著：《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邊：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232-247。

59 權以鎮：《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5冊，頁133。

自別。有戰則驅漢軍於先鋒，必置死地，戰勝則漢軍之賞最薄。其他凡百，無事不然，漢人又安得心服也？⁶⁰

按照李坤的觀察，當時距離明朝滅亡（1644）百有餘年，但漢人因為服制的關係，引以為恥。再者，旗人薄待漢人，因此漢人不心服。

綜觀燕行文獻關於滿漢的記述，吾人應注意到朝鮮使者時常強調少數民族（滿洲）統治多數民族（漢）的現狀，以及漢文化與滿洲文化的不協調，或者可稱為統合失敗。上述的記載，能夠直接視為中國史料，分析當時漢人與滿人的矛盾、隔閡，或是種族意識嗎？以下，分別從史實、文獻的角度深論，考辨燕行文獻的問題。

一、檢核見聞

朴趾源曾表示：

所謂軍機大臣，皆滿人也。嘗聞國中有機密大事，則皇帝密詔軍機大臣，同登高樓，自下去梯，聞樓上鈴聲，然後還置其梯。雖數日未聞鈴聲，則左右無敢近樓。⁶¹

首先，軍機大臣皆為滿人，有違史實，張廷玉（1672-1755）、徐本（?-1747）、蔣溥（1708-1761）都是漢人，先後入職軍機處。其次，皇帝與軍機處大臣商議國事，通常選擇在養心殿，或是於內廷宮殿召見大臣，實無「去梯保密」之事。朝鮮使者對於去梯保密的想像，應本於《三國演義》，即劉琦（?-209）請求諸葛亮（181-234）如何保密的橋段。⁶²

循著檢證史實的思路，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是成書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的《燕行備覽》，⁶³該書是目前所見的「燕行教科書」之一，⁶⁴或

60 李坤：《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3冊，頁138。

61 朴趾源：〈銅蘭涉筆〉，《熱河日記》，卷5，頁370。

62 〔元〕羅貫中：〈荊州城公子三求計 博望坡軍師初用兵〉，《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第39回，頁243。

63 該書現藏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長26.5公分，寬16.6公分，索書號：

可稱為「中國旅行指南」，迄今未見相關研究。《燕行備覽》本為作者端居子（真名待考）前往北京前，自行採摭編纂的參考書。作者蒐羅諸多相關官方文書，以及之前的燕行文獻，期盼能夠「資後學之憑信」。本書詳載路程遠近、沿路停留地點的歷史淵源，以及各種注意的事項。這本近似教科書地位的文獻，對那些準備出使，以及對中國感興趣的朝鮮知識人，提供一套行前參閱的「中國現況報告」。

《燕行備覽》是經過有意識地選擇，在十八世紀末期編纂而成的產品。儘管本書為寫本，不宜誇大此書的影響力，然其間關於「滿與漢」關係的討論，或可反映當時的看法。例如，前述朝鮮人假定清朝可能敗亡，出逃寧古塔、瀋陽的看法，《燕行備覽》云：「今則清人方據中土，故關東始無事變。萬一清人窘迫迸出而據之（瀋陽），〔……〕，必將最先於我國」可謂如出一轍。

滿漢關係方面，該書表示，康熙、雍正兩朝「滿漢角立已久」，康熙時對待滿漢尚一視同仁，「乾隆以來待遇滿漢，顯有彼此之殊」，漢官只是「充位而已」，於是「滿漢之讎源轉甚」。⁶⁵端居子的論據是：

皇太后周甲頌赦後，滿漢之在官者，各加一級。滿官則毋論已到住（任）、未到任，書許加級。漢官則未到任者，不許加級。以此觀之，待滿漢之懸殊，亦可推之。

3078.2.3102，作者署名端居子。首頁題「己酉七月二十五日始作」，序的落款時間是「歲昭陽赤奮若」，昭陽赤奮若即癸丑年。觀全書上下文，如「乾隆以來」、「近年以來」，應指 1793 年。又，該書未附上〈安南國王阮光平謝恩奏文〉，阮光平（即阮惠，1753-1792），同樣符合 1793 年的判斷。換言之，該書從 1789 年起草，1793 年成書，歷時 4 年。該書可於「高麗大學海外韓國學研究中心」線上瀏覽。《燕行備覽》不著頁碼，以下引文均出自該書。

64 另一本為復旦大學王振忠在法國法蘭西學院發現的《燕行事例》。筆者目前尚未見到本書出版，王振忠也尚未出版研究成果。相關訊息請參閱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海洋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集萃（三）」，<https://crlhd.xmu.edu.cn/2019/0412/c11776a366577/page.htm>，檢索時間：2019 年 8 月 16 日。

65 按照慣例，使行團的書狀官、譯官歸國後，會向國王提交報告書，稱使臣別單、譯官手本、聞見錄，其他成員也可提交別單。這段話顯然摘自乾隆十六年申思建提交的報告，這證明作者端居子確實參考許多燕行文獻，包含部分提交官方的別單。這段話見鄭昌順等（編纂）：《同文彙考》，第 12 冊（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年），頁 791-792。

這指的是乾隆帝（1711-1799）的生母孝聖憲皇后（1693-1777）六十大壽事。乾隆十六年（1751），孝聖憲皇后將屆六十周甲之慶，端居子根據清朝官方文書，指出當時清廷大赦天下，各級加官進爵。滿漢之在官者，各加一級，且滿官尚未到任者，特許加級，漢官則無。

清廷為孝聖憲皇后祝壽的儀式及相應的加恩，俱可考諸《清實錄》。乾隆十六年十一月，為祝壽事，確實「在京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各加一級」，除此之外還特別開示：

內外官員有因公註誤、革職留任者，該部查明奏請開復。

凡試職各官、俱准實授。⁶⁶

在這則布告中，確實也特別賞賜八旗官兵，但大體而言均涵蓋滿漢，如昭示「滿漢文武大小官員」，俱升一級。至於「內外官員」、「凡試職各官」，顯然前者區別的是在京官員與地方官員兩個系統，後者則是候補官員皆符合條件，與端居子指稱的「滿漢之懸殊」不同。

《燕行備覽》又云，清朝皇帝擁天子之號，入主中國後理當視滿漢為一體，「當一視滿漢無有區別」，然而「立國之初，先分彼此之限，主客已辨」。這種差異反映在法律上，居然出現「滿殺漢民，五償其一種，賦役皆有差等」，旗人殺害漢人，擁有換刑的特權。端居子的重點一如前述文獻，是區隔滿洲統治者與其他族群，並強調其他族群受制於旗人的狀況。其次，旗人殺害漢民，除死罪外得以換刑，這本是利用漢俗舊制，卻在朝鮮眼中成為滿洲特權的鐵證，凸顯兩造的不平等。⁶⁷儘管從清初以降，滿洲殺漢得以換刑的情況迭有轉變，也得以從法制史的角度詮釋其合理性，但重點是朝鮮使者在中國的訪查，將看似司法不公現象，轉成滿洲凌駕漢人的依據。在這樣的脈絡下，「滿人多富逸、漢人多愁苦」，甚至指出「道上流丐總是漢民」，均成為合情合理的斷語。

66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卷 403，頁 300，「乾隆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戊子」條。

67 關於滿漢之間的刑法是否公平，以及清朝統治者如何調節制度，符合民情的歷程，請參見鹿智鈞：《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2017年）。

換句話說，《燕行備覽》以及本文上述引用的燕行文獻，顯現朝鮮使者在概念上時常分離滿漢，有意無意間塑造滿洲欺凌漢人的形象。在這樣的背景下，清朝皇帝自然醜陋無文，政治不安，而漢人時時刻刻亟欲奮起革命。於是一六七七年，朝鮮使者權大載（1620-1689）向朝鮮肅宗報告，康熙帝常與侍衛共浴於太液池，游泳為戲，乃至「人不知何者為皇帝」，又云「皇帝只知清書，不解文字，故凡于文書，漫不省何事，一任該部之低昂云，是安能久有天下乎？南方事情，雖未能詳知，而國內形勢，似不得長久矣」。⁶⁸根據權大載的觀察，康熙皇帝只懂滿文，不解漢字，放任政事糜爛，直有亡國之危。⁶⁹

權大載的偏見是燕行使者慣常的說法，及至雍正十年（1732），韓德厚（1680-？）的觀察仍是「彼中事勢有不久之形。清人入主中國已近百年，以其運則將窮矣。昇平既久，朝野狃安，窮奢極欲，靡有限節」。⁷⁰不過這個朝鮮使臣向國王屢屢聲稱危在旦夕的國度，儘管乾隆年間仍被視為「外似昇平，內實蠱壞，以臣所見，不出數十年，天下必有大亂」，⁷¹卻始終沒有立即覆滅。由此顯見《燕行備覽》及十七、十八世紀的燕行文獻，每當涉及滿洲、清朝的描述，時常陷入一種負面的循環論述。

透過比較燕行文獻與清朝史料，特別是集中在滿洲，以及滿漢關係上，燕行文獻的特色極為明顯。首先，朝鮮知識人的見聞並不全錯，通常是基於部分的事實，進而引申己見。例如，清廷確實曾為孝聖憲皇后祝壽，頒詔加恩；軍機處辦事人員確實大部分為滿人；康熙皇帝也確實懂得滿文，但揆諸使者的報告，著實存在見縫插針、加油添醋之嫌。

按照前述崔德中的見解，清朝皇帝維持滿洲語文，目的是「守其

68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肅宗實錄》，卷6，《朝鮮王朝實錄》，第38冊，頁368，「肅宗三年九月庚寅」條。

69 權大載對康熙皇帝的觀察，自然與事實不符。事實上康熙皇帝曾數次告誡滿洲官員勿沾染漢俗（習），相關研究請參閱葉高樹：〈清初諸帝統治「中國」的危機意識〉，收入朱鴻、林麗月等（編）：《明清政治與社會：紀念王家儉教授論集》（臺北：秀威資訊，2018年），頁99-149。

70 韓德厚：《承旨公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0冊，頁93。

7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英祖實錄》，卷58，《朝鮮王朝實錄》，第43冊，頁117，「英祖十九年十月丙子」條。

本」，若「他日敗出之後，更行必難」。崔德中出使的時間係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可能像其他燕行使一樣，啟程前先蒐羅參考資料，如性質類似《燕行備覽》的行前手冊與其他使臣的日記，受到他們的影響。乾隆十九年（1754）的燕行使俞拓基（1691-1767）在瀋陽時，乾隆帝曾「以清書下旨意」，內容大略是「盛京即我國根本興起之地，關係至重且要」，⁷²崔德中可能見過類似的文書，藉此類記述抒發己見。

其次，朝鮮燕行使在乾隆年間之前，鮮有機會與清朝中階、高階士大夫交流，因為所見不多，他們容易基於原有的偏見，放大見聞的效力與意義。雍正二年（1724）權以鎮表示：「漢人見我人，全談清主之惡，見清人來則默而起去云」，頗為聳動。權以鎮同樣將中國見聞按「滿漢」區別，但未能從他的記錄中探知「清主之惡」的內涵。然而，對燕行文獻稍有概念者皆知，朝鮮使臣並不忌諱寫下此類漢人口中的「清主之惡」，權以鎮沒有必要忌諱留下相關記錄，這毋寧又是一種誇大的詮釋，而不是白紙黑字的實錄。

二、不斷因襲的燕行文獻

利用燕行文獻的另一問題，係出現「雷同」、「抄襲」前人著作。一九六七年，中研院近史所張存武（1929-）即表示，《燕行錄》雖然不少正面價值，「短處也有四點」，其中之一是「有些紀事並非聞見之作，而係展轉抄錄前人者，其史料價值甚微」。⁷³惜當時張存武並無舉例說明，後南京大學的張伯偉（1959-）、成均館大學的金玲竹曾深入討論此現象，⁷⁴張

72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啟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8冊，頁160。

73 張存武：〈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4卷第5期（1967年），頁42。

74 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氏（編）：《「燕行錄」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頁3-26。金玲竹（김영숙）：〈연행 體驗기록의 慣行과 그 매커니즘（中譯：燕行體驗記錄的慣行與其機制）〉，《漢文古典研究》，第34卷（2017年），頁265-304。張伯偉則指出，這種失實的問題普遍見諸東亞行紀文獻，牽涉到各種狀況，如前後抄襲、觀看態度與文學競賽的因素，克服的唯一途徑就是「全面、系統地閱讀史料」，見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

伯偉以萬曆二年（1574）許籛（1551-1588）的《荷谷朝天錄》為例，指出金昌業《老稼齋燕行日記》、崔德中《燕行錄》、李海應（1775-1825）《薊山紀程》、金景善（1788-1853）《燕轅直指》，皆有技巧地引用過該書，且部分沒有註明出處。張伯偉的評論是，若研究者沒有這層意識，或許會發生一些「離奇訛誤」的事情。

朝鮮使節抄襲前人的作品，須考量到他們在出發前通常會參考之前的使行記錄，以及使行的路線、入北京後的儀式，基本上變化不大。使者為求簡便，直接抄錄之前的記述，事理當然。僅以《燕行錄全集》為例，收錄三百餘種的作品，精裝一百冊巨帙，鮮有人全部通讀。大部分的使用者多擇與研究興趣相近者翻看，難以掌握文本的史源，乃至判斷是否抄襲。關於滿洲、清語、清書的材料同樣存在這樣的問題，以下按照年代排序，以金昌業為例，析論燕行文獻的問題：

（一）康熙五十一年（1712），金昌業

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不能為清語，非不能也，不樂為也。然不能通清語，於仕路有妨，蓋闕中及衙門皆用清語，奏御文書皆以清書繙譯故也。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以此清人後生少兒多不能通清語。皇帝患之，選年幼聰慧者，送寧古塔學清語云。⁷⁵

（二）乾隆十四年（1749），俞彥述

清人能漢語，而漢人則不能為清語，非不能也，蓋不欲為也。以其閭巷之間，恒用漢語，故清人後生小兒，多不通清語。清主患之，選其年幼者，送于寧古塔學習清語云。⁷⁶

（三）乾隆四十二年（1777），李埤

2017年），頁234-269。

75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1冊，頁289。

76 俞彥述：《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9冊，頁281。

清人、蒙人則皆用漢語，漢人則不用清語。而然闕中及衙門，則必令用清語，故漢人之出於仕路者，不得不學習清語云。⁷⁷

（四）道光十二年（1832），金景善

清人皆能漢語、漢書，而漢人不能滿語、滿書。故凡闕中衙門機密事皆用清語，奏御文字皆以清書繙譯。閭巷則滿漢皆用漢語，故滿人後生多不解清語，皇帝患之，每選年幼聰慧者，送寧古塔學滿語云。⁷⁸

（五）道光二十八年（1848），李有駿

大抵清人皆能漢語，而漢人不能清語。閭巷則無論清漢皆用漢語，以此，清人後生能清語者絕少。每選年幼聰慧者送置寧古塔學清語。⁷⁹

筆者尚無法找到比金昌業更早的例子，雖不能排除金昌業抄襲某位使者的可能性，姑且先將金昌業視為首位撰寫者。上述五段文字，始於一七一二年，終於一八四八年，橫跨一百三十六年。通觀他們的見聞，可以認定後四人全都直接抄錄，或改寫自金昌業的記述。金昌業的重點有二：其一，旗人會說漢語，漢人卻不懂滿洲話，這不是漢人能力不足，而是不樂為之。其二，清朝皇帝擔憂旗人不懂清語，於是揀選年幼聰慧者至寧古塔學習。

根據《清實錄》，筆者未能找到清朝皇帝派遣旗人前往寧古塔學習清語的事例。恰好相反，嘉慶帝（1760-1820）還曾斥責東三省出身的官員「不能清語」，因為「東三省係我朝根本之地，清語即如鄉談，原應不學而能，乃竟有不曉清語之人，想東三省似此者尚復不少」。⁸⁰至少在嘉慶八

77 李坤：《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3冊，頁76。

78 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2冊，頁345。

79 李有駿：《夢遊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冊，頁41。

80 〔清〕曹振鏞等（纂修）：《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卷

年（1803），不宜誇大東三省出身者的語言能力，以及當地維持清語風俗的狀況。金昌業認為年幼聰慧者送至寧古塔，或許是假定東北係大清龍興之地，舊俗維持得宜。

再者，關於漢人不樂學習清語，以及漢人少有通清語者，則可能是聽聞清廷力勸學習滿洲語文的命令。最重要的是，這種基於康熙年間的金昌業身上的論斷，是否能直接應用到後面四者的歷史狀態。研究者倘不經考察，逕自引證，指稱「皇帝患之」，此皇帝為誰？不解清語的時間為何時？皆會因為缺乏文獻學的分析，驟失論述效力。

肆、 燕行文獻的問題與可能的解決方法

燕行文獻部分記載失實，且抄襲前人著作的問題，係所有史料都必須面對的挑戰。本文析論此類事例的用意，絕非主張「不能使用燕行文獻」研究中國史。重點是面對晚近大規模影印問世的域外文獻，中國史學者需要針對不同的課題，建立甄別、審酌的方法。僅以關於滿洲的記述為限，筆者認為具體可資操作的標準有三，一是關注朝貢事務性的記載，避免有太多價值判斷的觀察；一是注重筆談材料，尤其是雙方交往密切者，而最可行的方式莫過於「類纂」。以下簡要地舉例討論。

一、朝貢事務性記述

清代的官方文書使用滿文，朝堂上的唱班說滿語，這對嫻熟漢文的朝鮮燕行使而言格外特別。透過本文伊始呈現的朝堂畫面，能發現朝鮮使者細心地記錄所見所聞的滿洲語文；此類在朝貢事務中親睹的狀況，通常是如實直書，少有綜合性的評語，尤其是清朝、朝鮮雙方互動的細節。審視朝鮮貢使在宮廷與清朝官員乃至皇帝的互動，得以呈現清朝方面對滿洲特性的重視。例如，清朝皇帝接見朝鮮使臣時，時常且樂於說滿洲話。金昌業一行人在朝堂上曾與康熙帝對談，雙方本是倚靠漢語譯官交流，但康熙

113，頁 501，「嘉慶八年五月九日」條。

帝卻突然說起滿語，朝鮮使者一頭霧水。⁸¹

乾隆帝的興致比起乃祖更高，他曾幾次嘗試對朝鮮貢使說滿語，朴趾源等人就曾與乾隆帝有過以下的近身接觸：

皇帝問：「國王平安？」使臣謹對曰：「平安。」皇帝又問：「有能滿洲話者乎？」上通事尹甲宗以滿話對曰：「略解。」皇帝顧視左右而喜笑。⁸²

乾隆帝在慰問朝鮮國王平安後，問道是否有能說滿洲話的人，一旁的清譯尹甲宗以滿語回應「略解」，皇帝帶著笑意，看著四周的人。此處的「左右」是清朝官員，且很可能是旗人。而乾隆皇帝顯然很滿意這個回答，樂於聽朝鮮使臣說滿洲話。

儘管之後的幾個事例，朝鮮使臣都沒能適時帶上清譯，但仍可略窺乾隆皇帝在接見朝鮮使臣時，熱衷使用滿洲話。乾隆五十五年（1790）出使的徐浩修回國覆命時，朝鮮國王引見徐氏於重熙堂，問道：「皇帝與卿等酬酢時，誰為傳語？」徐浩修表示是譯官。又云皇帝再次召見時「問有清、蒙語者？」徐浩修一行人未帶清語翻譯官，遂不了了之。⁸³隔年（1791），金士龍（生卒年不詳）遭遇同樣的景況，乾隆皇帝再次問及「使臣知清語乎？」⁸⁴金士龍一行也因為清譯沒有隨同參謁，遂無下文。觀諸上述幾例，康熙帝、乾隆帝在朝堂上與朝鮮使者互動時，頗希望能用滿語對談，這均是不見諸中國史料的記載。

若將焦點擺脫清宮，轉而關注朝鮮使者在宮外與旗人的互動，尤其是筆談交流的文獻，同樣能發現關於旗人的記述。筆談史料當然也可能造

81 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46。載言：「帝有所云云，而俱是清語，不可曉。」

82 朴趾源：〈太學留館錄〉，《熱河日記》，卷2，頁138。這段對話同樣見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正祖實錄》，卷10，《朝鮮王朝實錄》，第45冊，頁183，「正祖四年九月十七日壬辰」條。

83 這段徐浩修與朝鮮國王的對答出自徐浩修：《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2冊，頁269-271。

84 金士龍：《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4冊，頁449。

假，但與滿洲相關的文字，通常在不涉及價值判斷的部分，可信性較高。洪大容在瀋陽曾與一位周姓塾師筆談，他表示：「關東水土硬，肉食太重，子弟聰明者少而昏魯者多，不以念書為事。祇以清書、滿洲話求取功名，最易又快」。⁸⁵遼東一帶，文教不興，滿洲子弟只以清書求取功名為念，因為得效最速。洪大容所見一位瀋陽府學助教永壽，他的長子略解漢字，「惟讀滿洲四書，以待考試」，⁸⁶凡此頗有助吾人理解旗人繙譯科考的實態。

二、筆談史料

分析清代的滿、漢關係，筆談材料雖在先天上欠缺綜合性的評述，但適當地運用其特色，即當下的反應互動，能獲致更接近漢人內心的證詞。首先必須意識到，漢人在與朝鮮使者筆談時，極其謹慎；朴趾源的觀察是「雖尋常酬答之事，語後即焚，不留片紙」，這源於清朝的高壓統治，於是普遍所見不外乎「開口稱頌、舉筆諛佞」。⁸⁷這基本上說明何以燕行文獻少見漢人批評時政，並凸顯在交往密切的情況下，跨越時禁的言說格外真實。洪大容與杭州三士的交往，⁸⁸適足以考察時人如何理解滿漢關係。

洪大容與清朝儒生嚴誠（字力闇，1732-1767）、潘庭筠（字蘭公，1742-?）最善。當雙方談及音樂，嚴誠曾評論：「北音雜以胡樂，皆是金石噍殺之聲。即塗抹之」，⁸⁹認為北方音樂雜揉胡樂，均為殺伐之聲，後很快意識到這樣的文字不妥，立刻塗黑。洪大容曾詢問潘庭筠，乾隆皇帝意欲廢后之事，潘氏的回應是：「我朝家法無廢立事。且皇太后有聖德，故

85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頁194。

86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頁158。

87 朴趾源：〈黃教問答〉，《熱河日記》，卷3，頁165。

88 關於洪大容與中國儒生的交往，被學界視為交往最密切的案例之一。相關研究請參閱金泰俊：《洪大容評傳》（서울：民音社，1987年）。金泰俊：《虛學から実学へ——18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孫衛國：〈朝鮮燕行士人與清朝儒生——以洪大容與嚴誠、潘庭筠、陸飛交往為中心〉，收入氏著：《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頁157-187。

89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3。

賴以無事。滿人阿永阿極諫幾死，漢人無一人敢言者。可愧！」⁹⁰洪大容並補充潘庭筠此時「隨書隨裂，舉措慌忙」，表明此番評論是無意間說出的。潘庭筠遺憾漢人官員無一人敢言，對照滿人刑部侍郎阿永阿，他顯然是將漢人、滿人官員各自作為一個群體。

潘庭筠的乾爹是旗人，時任戶部筆帖式，⁹¹很難說潘氏是一位「種族主義者」。不過他對於漢官無作為的憤恨，以及無意間透露的滿漢意識應非虛詞，這揭示平時相處融洽的滿與漢，隱約仍有一條跨不過的界線，只有在情緒充滿張力的狀況下，方才浮現。在大清入關前，漢人與滿人的差異顯而易見，因為髮服全然不同。潘庭筠此類知識人熟讀典籍，皆知中國傳統的服飾與當時的服制不同，儘管潘氏曾引用聖諭：「如效漢習，諸事便怠惰，忘騎射，少淳朴，失禮度」，表示「是以我朝聖聖相傳，不效漢人衣制」。⁹²然而在洪大容言詞懇切地勸說下，期盼嚴、潘二人未來為官，當恢復漢衣冠；潘雖然委婉地稱「未必為官」，卻也應允「不敢忘」，⁹³可見他明瞭滿、漢之間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是朴趾源與清朝舉人王鵠汀的筆談。他們討論「衣冠之制」時，有一段涉及纏足，朴趾源先介紹朝鮮之法，王舉人接著答道：「本朝禁令至嚴，終禁他不得，蓋男順女不順也」朴趾源認為女子纏足後，步行不便，為何要特別維持？鵠汀應道：「恥混韃女」，隨即抹掉這句話，又寫下「抵死不變也」⁹⁴王鵠汀的回答是極其珍貴的線索，首先「男順女不順」，又云「男降女不降」指的是男子順從清朝，剃頭辮髮、女性抵抗，維持裹腳，這種具有族群外觀性的區隔，曾在晚清成為革命口號，是具備種族性質的話語。⁹⁵重點是鵠汀認為女性應抵死不變、「恥混韃女」，他的順是「順服清朝」，他的恥是恥混滿洲女性，這均凸顯滿漢之間的迥然有別。

90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衙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69。

91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衙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1。

92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衙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2。

93 洪大容、李德懋：《乾淨衙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頁 103。

94 朴趾源：〈太學留館錄〉，《熱河日記》，卷 2，頁 132。

95 夏曉虹：〈歷史記憶的重構——晚清「男降女不降」釋義〉，收入氏著：《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頁 114-141。

三、類纂

自張存武以降，夫馬進（1948-）、張伯偉先後指出燕行文獻的失實問題，迄今仍未有妥切的解決辦法。畢竟燕行文獻成千上百種，⁹⁶即便是竟讀全帙的學者，仍不免一時失察而遭受波及。⁹⁷儘管種類繁多，克服燕行文獻前後抄錄、因襲、雷同問題的方法，筆者認為是類纂，而這著實是在「資料庫時代」最容易被忽略、放棄的選項。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成均館大東文化研究院推出兩冊《燕行錄選集》，引起學界關注。《燕行錄選集》係經過精挑細選的成品，朴趾源、洪大容一脈北學派士人的著作均榜上有名。近似的建議早見於二〇〇一年，延世大學名譽教授黃元九（1929-2004）曾建議，應以《燕行錄選集》為中心，類纂成《燕行錄紀事分類》。⁹⁸類纂最能針對燕行文獻的特性，只待將各種記事分類完畢，何處抄襲均一目了然。再者，釐清何處抄襲，不僅能夠確定史料是否可用，更能藉此討論那些地方最容易被抄襲，那些記述最被忽略。目前的研究指出，許筠、金昌業、洪大容、朴趾源的作品最容易被引用／抄襲，⁹⁹應以這四種燕行文獻為底本，搭配資料庫製成類纂。

四、滿洲與朝鮮

最後，本文擬簡要地討論另一個與滿洲相關的議題，有助理解以燕行文獻探究滿洲相關問題的價值。如前所述，清朝皇帝在宮廷、行在等處，

96 北京大學漆永祥估計總數應在 1074-1124 種之間，見氏著：〈關於「燕行錄」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 7 輯（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7-66。

97 張伯偉以葛兆光的研究為例，指出研究者可能面對「文獻的前後抄錄導致的失實」，見張伯偉：〈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頁 241。

98 黃元九（황원구）：〈연행록 연구의 과제（中譯：燕行錄研究的課題）〉，《한국문학연구》，第 24 輯（2001 年 12 月），頁 9-10。

99 這幾本書在十八世紀的朝鮮國內，已被認為是傑出的燕行之作。見金景善：《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0 冊，頁 246。關於這四種書被「抄襲」、匿名「引用」的情形，請參閱張伯偉〈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東亞行紀「失實」問題初探〉二文，均收入氏著：《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

常詢問朝鮮貢使是否能說滿語，這種情況同見於朝鮮使者與其他旗人的交流，且次數頻繁。如洪大容在東安門附近旁觀旗人射箭，就被問及「爾會滿洲話乎？」¹⁰⁰三日後，在正陽門一帶，又曾與一位侍衛官聊天，他同樣詢及「爾會滿洲話乎？」¹⁰¹朴趾源也曾有相同的經歷。¹⁰²過去的研究通常利用此類線索，討論少數朝鮮使者優異的語言能力，尤其是洪大容嫻熟漢語，也略解滿、蒙的簡單問候，有利於他在中國交遊。然而清朝皇帝、宮外的旗人對朝鮮使節的興趣，著實值得深入探討。

儘管缺乏直接證據，但旗人詢問朝鮮人是否懂得滿洲語文，筆者認為原因是他們身旁不乏能說滿語的朝鮮人。早在弘治元年（1488）朝鮮官員崔溥（1454-1504）提交給朝鮮國王的見聞錄《漂海錄》即稱：「海州、遼東等處人，半是中國，半是我國，半是女真」，¹⁰³顯見中朝邊境族群雜處的景況。及至一六三六年丙子胡亂，大量朝鮮平民被擄，八旗中就有不少朝鮮佐領，或稱高麗佐領。¹⁰⁴多爾袞（1612-1650）更曾屢屢徵女朝鮮，¹⁰⁵均可見滿洲與朝鮮交往之密切。對於不少旗人而言，他的家族成員，可能就有朝鮮淵源。

這群被朝鮮使者稱為「朝鮮人子孫」、「東人之子」、「被虜（擄）人子孫」¹⁰⁶的「旗人」，頻頻現身燕行文獻。他們「以朝鮮人子孫入仕中國，世為大官」，¹⁰⁷有時協助朝鮮使者周旋說項。例如活躍於雍正、乾隆

100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頁389。

101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42冊，頁393。

102 朴趾源：〈還燕道中錄〉，《熱河日記》，卷3，頁151。

103 崔溥著，朴元燾（校注）：《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2013年），頁165。

104 徐凱：〈朝鮮佐領考〉，《韓國學論文集》，第7期（1998年9月），頁313-319。
徐凱：〈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2000年10月），頁62-73。劉小萌曾研究一位旗籍朝鮮人安岐（1683-1744），他堪稱典型的朝鮮人子孫，見劉小萌：〈旗籍朝鮮人安氏的家世與家事〉，《清史研究》，第4期（2013年11月），頁1-19。

105 李光濤：《多爾袞徵女朝鮮史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頁279。

106 這些稱呼見諸金昌業：《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2冊，頁54。

107 李埈：《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53冊，頁435。

年間的金常明，「其祖先被擄於丁卯之亂，遂為清人，渠（金常明）之祖母即汗之乳母，渠則與康熙自幼共嬉游」，¹⁰⁸常明自小生長於中國，是一位朝鮮裔的旗人。因著與皇室的關係，常明號稱「為皇帝寵信，外與十三王同心，多有權力，故今行大事，亦賴此人周旋順成」。¹⁰⁹由此得以理解，為何旗人與朝鮮使者交流時，多次主動詢問是否會說滿語，同時或許能夠說明這樣的例子何以不見諸越南、琉球使行文獻。¹¹⁰

必須說明的是，儘管清代的朝鮮燕行使透過金常明等管道，廣泛蒐羅清代中國的情報，大部分的朝鮮知識人或因對明朝的眷戀與忠誠，或對清朝統治的不認同，形成一種強烈質疑清朝統治正當性的風潮。¹¹¹在這樣的脈絡下，朝鮮使者往往忽略對於清朝正面客觀的評價，加上燕行使的資訊來源，很大一部分源自清朝的序班，而他們為賺取情報費，誇大事實，隱善揚惡，嚴重影響朝鮮使者的判斷。¹¹²

總而言之，朝鮮與滿洲往來很早，又因為地理、歷史陳因，在清代更形密切。朝鮮使者連年進京參謁，留下豐富的資料，固然珍貴；然而不可或忘的是，對於旗人而言，朝鮮其實也是特殊而熟悉的族群，他們的家庭成員可能就有朝鮮背景。朝鮮使者屢被詢及滿洲語文之事，意義正在於因著這層背景，清朝皇帝或許更願意向朝鮮人展示滿洲特性；而透過宮廷中的朝鮮人子孫，使臣的見聞也較他國使節深入。清人入關之前，朝鮮使者

108 俞拓基：《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8冊，頁101。關於金氏家族的研究，請參見黃麗君：〈八旗制度與族群認同：清前期中朝關係史中的內務府高麗佐領金氏家族〉，《清史研究》，第2期（2019年5月），頁64-77。

109 趙文命：《燕行日記》，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92冊（서울：民族文化推進黨，1997年），頁192。

110 關於琉球、越南文獻的論斷，有待更多研究檢驗，筆者謹記於此，供方家參考。

111 姜在彥：〈「崇明排清」の思想〉，收入氏著：《朝鮮儒教の二千年》（東京：朝日新聞社，2001年），頁337-365。孫衛國：〈朝鮮王朝對清觀之演變〉，收入氏著：《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頁261-287。

112 例如朴趾源便曾直言序班：「此輩大為謊說，其言務為新奇，皆恠恠罔測，以賺譯輩剩銀。時政則隱沒善績，妝撰秕政，天災時變、人妖物怪，集歷代所無之事；至於荒微侵叛，百性愁怨，極一時騷擾之狀。有若危亡之禍，迫在朝夕，張皇列錄，以授譯輩。譯輩以呈使臣，則書狀揀擇去就，作為聞見事件。」見朴趾源：〈口外異聞·別單〉，《熱河日記》，卷4，頁289。

申忠一（1554-1622）的《建州聞見錄》是最早關於滿洲社會的觀察。入關之後，朝鮮貢使在中國北方的遊歷，以及紫禁城的查訪，仍舊是少數接近核心的見聞，可謂其來有自。

綜上所述，燕行文獻中關於滿洲、滿漢關係的描述，著實是一大寶庫。然而，倘若從整體評估此類記述如何進入使臣的視野，必須區分不同層次，例如「朝貢期間的事務性見聞」，與「對中國社會的概括性評論」，性質不可相提並論。再者，援引朝鮮史料分析中國歷史，勢必意識到「朝鮮立場」的問題，探究朝鮮使者的心理狀態、中國與朝鮮的歷史背景，以及對比中國史料後，方才得以釐清這是「誰的聲音」。朝鮮與滿洲的關係緊密，但也正因著這層緣故，更多的見聞與記述，並不全然帶來真實的觀察，而是夾雜著情緒與偏見。甄別、審酌的方法其實就是在各種層次上披沙揀金，逐步釐清中國、朝鮮的關係。

伍、 結語

析論燕行文獻呈現的滿漢關係，必須考量朝鮮使者關於清書、清語的記述。這是一張連動的網，碑刻上的滿洲字、清宮裡的滿洲話，不單是燕行使筆下的見聞，同時成為他們分別滿漢的資源。本文大致梳理燕行文獻中清書、清語在不同語境的所指及其意義；這有時只是單純的照錄，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在瀋陽以滿文頒行的諭旨，為當時朝鮮使節團的清語譯官錄下，保存在使節的日記中。乾隆皇帝反省道：「盛京官員及軍丁等，騎射及馬上技藝俱是兒戲。清語又最生疎，漸入於漢俗，而清人古道一切拋棄者，又不及於（乾隆）八年」¹¹³相較於乾隆八年時巡視所見，十九年時盛京滿洲官兵對滿洲的「古道」學習已大不如前。來自域外的使者，為吾人保留一條探究滿洲特性的證據。

然而更多的是主觀性的斷語，朝鮮使臣的觀察不僅體現清朝官方常規

113 俞拓基：《瀋使還渡江狀啟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8冊，頁160-161。

的行政流程、宮中大量使用滿洲語文的日常，更重要的是揭示清朝皇帝、滿洲官員刻意使用滿洲語文的面向。根據朝鮮使者的見聞，清朝皇帝、官員與朝鮮使者交接時，滿洲話曾發揮保密防諜的功能。朝鮮使者同時意識到，清朝皇帝的諭令，目的是維護滿洲之道。

透過本文的整理與分析，顯然朝鮮使者想像、先驗的滿漢關係，與他們直觀寫下的觀察、較趨近「真實」的記述並不相同。可以說燕行文獻自非如實直書，朝鮮知識人對滿洲的負面評價，連帶影響到如何理解他們所見的滿漢關係。在他們眼中，滿洲自始即欺壓漢人，鼎革之際「有戰則驅漢軍於先鋒，必置死地，戰勝則漢軍之賞最薄」；¹¹⁴入關後特權依舊，滿洲「殺漢民，五償其一種，賦役皆有差等」，¹¹⁵滿漢始終有別。種種滿漢在制度上的差異，朝鮮使者不是擴大詮釋，便是顛倒因果，一一化身成為證明滿漢有別的根據。

史料本身的問題可能造成各種誤判，研究者應多注意朝貢事務性的描述，以及筆談資料。指揮朝儀秩序的清語口令、等待奏疏翻譯成清書的流程，以及清朝皇帝與朝鮮使臣交談的過程，通常是不涉及價值判斷，回報朝鮮國內參考、評述較為中立的情報。筆談雖也有造假、事後修飾的可能性，但少數交情深切、描寫細膩的觀察仍值得深入挖掘。本文以朝鮮使者洪大容與潘庭筠、朴趾源與王鵠汀的筆談為例，指出盛清時期的漢人士子確實有意識地分別滿漢，且對於詆毀滿洲風俗感到不安，這是一份不見於中國史料的供詞，惜此類文獻並不多見，目前尚無法更細緻地論述，有待未來的研究者更深入地檢查朝鮮文獻。

值得注意的是，燕行文獻豐富的記錄，不僅源自朝鮮使臣是少數如此親近旗人的群體，遵行參謁宮廷的慣例，還須考量旗人不乏「朝鮮人子孫」。朝鮮使者頻頻被問及「是否懂得滿洲話」，¹¹⁶正源自旗人的家族、朋友就有能說滿洲語言的朝鮮人。

114 李埈：《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頁 138。

115 端居子：《燕行備覽》（柏克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序寫本，1793 年），寫本未著頁數。

116 洪大容：《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頁 389、393。朴趾源：〈還燕道中錄〉，《熱河日記》，卷 3，頁 151。

燕行文獻係基於朝鮮立場的文本，應注意到朝鮮使者珍稀的見聞，存在雷同、抄襲等問題，¹¹⁷至於朝鮮知識人的偏見及其轉變，則是中朝關係史研究者的重要課題。然而中朝關係史的重心，大多仍偏向「朝鮮史」，儘管有從域外看中國的新意，卻也不免讓中國史家有「外國史話題」的圈外感受。透過本文的討論，朝鮮使者眼中的清代宮廷，確實帶有濃厚的滿洲色彩，尤其是在各種場合充斥滿文、滿語，為吾人考察清代中國另闢新章。如何審視這批姑且稱作「不中不朝」的史料，則有待更多學人的關注。

一九八六年，在聯合報國學文獻館的支持，以及時任臺灣大學歷史系教授陳捷先（1932-2019）的奔走之下，召開第一屆「中國域外漢籍國際學術會議」，此後又舉辦九次，共出版十冊會議論文集。「域外漢籍」一詞是臺灣學者的創發，對此議題關注之早，亦為世界之最。在首屆的大會結束後，臺灣的史學、文學研究者莫不振奮，畢竟這場盛會被視為「傳統漢學研究的重大突破」。¹¹⁸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九日，在魏延年的宅邸召開「域外漢文學的出版與研究」座談會；三十年前，臺灣學者群聚一堂，思量如何整理域外漢籍。他們缺少良好、完整的目錄，不清楚域外漢籍確切的數量，甚至連越南歷史的編年工程都尚處草創期。如今回首，當時前輩學人對於域外漢籍的困惑，以及實務上的困難已非今人的障礙。

三十年來，域外漢籍的巨帙叢書迭出，無有紀極。充足的史料帶來豐富的議題，如今高唱「域外漢籍學」、「燕行錄學」¹¹⁹者不乏其人，正源於此。如何利用這批藏於域外的史料，意見紛呈。傳統的文獻目錄學家搜訪逸書，目的是檢校缺漏，完成善本。近年復旦大學葛兆光（1950-）則提出「從周邊看中國」、「不在場的在場者」等研究視野，認為中國史研究

117 夫馬進表示，關於《燕行錄》的基礎性研究，可以說幾乎沒有，致使研究者無法推進研究。見夫馬進：《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頁423。這種呼籲有系統地（題解、標點、註解、選別）整理《燕行錄》的觀點，同樣見諸韓國學者，如成均館大學漢文學系教授金榮鎮（김영진），見氏著：〈燕行錄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법에 대한 試論〉，《大東漢文學》，第34輯，頁65-91。

118 陳慶浩（時任法國遠東學院研究員）語，出自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年），頁177-178。這場座談會的發言記錄見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域外漢文小說論究》，頁171-186。

119 邱瑞中：〈燕行錄學引論〉，收入氏著：《燕行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235-242。

者也能運用域外文獻，探討中國史的議題。¹²⁰

汲取域外文獻，作為中國史研究的資源，不是晚近的發明。早在上個世紀三〇年代，明史學者吳晗（1909-1969）就開始摘抄《朝鮮王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即後來十二冊《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陳寅恪（1890-1969）也曾表示王國維（1877-1927）的治學方法係「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¹²¹中研院史語所李光濤（1897-1984）主張「閱明清檔案，須再閱朝鮮實錄」。¹²²當代學者對域外文獻的關心，其來有自。

量變帶來質變，域外漢籍的數量自非民初，乃至三十年前可比。當代學者矚目的主要課題是，如何基於域外漢籍的新景況，開展方法與議題。相形之下，如何利用文獻，作為「傳統中國史研究」的史料，可以說相對受到忽視。至少就清史研究而言，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曾推出三冊《清入關前史料選輯》，排印《燃藜室記述》、《建州紀程圖記》、《丙子錄》、《亂中雜錄》、《柵中目錄》，全都是朝鮮漢文文獻。本文深入辨析燕行文獻中的滿漢關係，不僅希冀藉此凸顯燕行文獻的價值與問題，更希望揭示域外漢籍不應僅作為中外關係史，乃至朝鮮史的文本。

循著民初學人對「朝鮮史料」的關心，除當時大量利用的《朝鮮王朝實錄》外，今人得見諸多更加原始的史料，卻也產生有待克服的新問題。如本文所陳，僅以滿洲相關議題為例，其間謬誤不斷，且摻和不少朝鮮知識人的偏見。燕行文獻在史實上的錯誤不是研究上的困難，而是中國史家大展長才的場域，是理應涉入的分野。援引域外文獻研究中國，不惟需要中外關係史家的奧援，更迫切的是中國史研究者的投入。如何針對不同議題，在史實與方法上逐步廓清，具體分疏燕行文獻的特性與問題，仍有待

120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葛兆光：〈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2014年6月），頁1-62。

121 關於吳晗以及民初學人對域外文獻的關心，請參閱王維佳：〈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之編纂與價值〉，《史學月刊》，第6期（2015年6月），頁15-24。

122 李光濤：〈記李氏朝鮮實錄〉，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論集（一）》，頁143。

更多的省思，而這正是未來值得開發的重要課題。◆

引用書目

古代文獻

- 〔元〕羅貫中 LOU, Guanzhong
1989 《三國演義》（臺北：三民書局，1989年）。
Sanguo Yanyi (Taipei: Sanmin Shuju, 1989).
- 〔清〕慶桂、董誥等（纂修） QING, Gui & DONG, Gao et al (eds.)
1986 《清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Qinggaozong Chunhuangdi Shil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6).
- 〔清〕曹振鏞等（纂修） CAO, Zhenyong et al (eds.)
1986 《清仁宗睿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Qingrenzong Ruihuangdi Shilu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86).
- 〔清〕允禩等撰 YUN, Tao et al (au.)
1983 《欽定大清會典》，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1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
Qinding Daqing Huidian, in *Wenyuange Siku Quanshu*, Vol. 619 (Taipei: Taiwan Shangwu Yinshuguan, 1983).
- 〔清〕紀昀等撰 JI, Yun et al (au.)
1989 《歷代職官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Lidai Zhiguanbiao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9).
- 〔朝鮮〕朴趾源 BAK, Jiwon 박지원
1997 《熱河日記》（上海：上海書店，1997年）。
Yeolha Ilgi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1997).
- 〔朝鮮〕李有俊 YI, Ujun 이우준
2001 《夢遊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7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
Mongyu Yeonhaeng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7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田秀 YI, Jeonsu 이전수
2001 《入瀋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30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
Ibseonyang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0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安訥 YI, Anmal 이안눌
2001 《朝天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15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年）。

- Jocheon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15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頤命 Yi, Imyeong 이이명
2001 《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4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Jabj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4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垓 Yi, Gab 이갑
2001 《燕行記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3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Gisa,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53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宜顯 Yi, Uihyeon 이의현
2001 《庚子燕行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5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Gyeongja Yeonhaeng Jabj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5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李器之 Yi, Giji 이기지
2011 《一庵燕記》，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成均館大學東亞學術院大東文化研究院（編）：《韓國漢文燕行文獻選編》，第 13 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1 年）。
Ilam Yeongi, i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 Sungkyunkwan University, Academy of East Asian Studies, Deaedong Institute for Korean Studies (eds.), *Hanguo Hanwen Yanxing Wenxian Xuanbian*, Vol. 13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1).
- 〔朝鮮〕金士龍 Gim, Sayong 김사룡
2001 《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4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74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金昌業 Gim, Changeob 김창업
2001a 《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1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1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001b 《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2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 Yeonhae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2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金景善 GIM, Gyeongseon 김경선
 2001 《燕轅直指》，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72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keul Jigj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72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俞拓基 YU, Takgi 유척기
 2001a 《藩使還渡江狀啓別單》，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Simsa Hwandogang Janggyebyeoldan,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8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01b 《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8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8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俞彥述 YU, Eonsul 유언술
 2001 《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9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gyeong Jabj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9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洪大容 HONG, Daeyong 홍대용
 2001 《湛軒燕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2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Jamheon Yeon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42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洪大容、李德懋 HONG, Daeyong & YI, Deokmu
 홍대용 & 이덕무
 2010 《乾淨衙筆談 清脾錄——朝鮮人著作兩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Ganjingtongbitan Qingpilu: Chaoxianren Zhuzuo Liangzhong (Shanghai: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2010).
- 〔朝鮮〕徐文重 SEO, Munjung 서문중
 2001 《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4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Il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24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 徐長輔 SEO, Gildo 서장보
 2001 《蔚山紀程》，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66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Sapsan Gijeon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66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 徐浩修 SEO, Hosu 서호수
 2001 《熱河紀遊》，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2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lha Giyu,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52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 崔溥，朴元煥（校注） CHOE, Bu 최부 (au.),
 PARK, Won-hyo 박원호 (proof. & an.)
 2013 《崔溥漂海錄校注》（上海：上海書店，2013 年）。
Cuipu Piaohailu Jiaozhu (Shanghai: Shanghai Shudian, 2013).
- [朝鮮] 崔德中 CHOE, Deokjung 최덕중
 2001 《燕京雜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40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gyeong Jabj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40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 魚叔權 EO, Sukgwon 어숙권
 1971 《稗官雜記》，收入《韓國漢籍民俗叢書》，第 1 輯，第 8 冊（臺北：東方文化，1971 年）。
Paegwan Jabgi, in *Hanguo Hanji Minsu Congshu*, Ser. 1, Vol. 8 (Taipei: Dongfang Wenhua, 1971).
 2012 《攷事撮要》，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 3 輯，子部第 10 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12 年）。
Gosa Chwalyo, in *Yuwai Hanji Zhenben Wenku*, Ser. 3, Zibu Vol. 10 (Chongqing: Xinan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2).
- [朝鮮] 朝鮮世子侍講院 JOSEON Seja Sigangwon 조선세자시강원
 2001 《瀋陽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5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Seonya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25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 朝鮮世祖（命編） JOSEON Sejo 조선세조 (o.)
 1461 《北征錄》（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藏李克堪序刊本，1461 年）。
Bukjeonglog (Collec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East Asian Library, 1461, Handwritten Copy).

- 〔朝鮮〕閔鎮遠 MIN, Jinmeol 민진원
 2001 《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6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Il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6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端居子 DAN, Geoja
 1793 《燕行備覽》（柏克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東亞圖書館藏序寫本，1793 年）。
Yeonhaeng Bilam (Collected in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East Asian Library, 1793, Handwritten Copy).
- 〔朝鮮〕趙珩 JO, Hyeong 조형
 2001 《翠屏公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0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Byeonggong Yeonhae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20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趙憲 JO, Heon 조헌
 2001 《朝天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Jocheon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5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趙文命 JO, Munmyeong 조문명
 1997 《燕行日記》，收入韓國古典翻譯院（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192 冊（서울：民族文化推進會，1997 年）。
Yeonhaeng Ilgi, in Institute for the Translation of Korean Classics (eds.) *Hangug Munjib Tteolkan*, Vol. 192 (Seoul: Minjog Munhwa Chujinhoe, 1997).
- 〔朝鮮〕鄭昌順等（編纂） JEONG, Changsun 정창순 et al (eds.)
 1980 《同文彙考》（臺北：珪庭出版社，1980 年）。
Tungwen Huikao (Taipei: Guiting Publishing, 1980).
- 〔朝鮮〕韓泰東、韓祉 HAN, Taedong & HAN, Ji 한태동 & 한지
 2001 《兩世燕行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29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angse Yeonhaeng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29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 〔朝鮮〕韓德厚 HAN, Deokhu 한덕후
 2001 《承旨公燕行日錄》，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50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Seungdagong Yeonhaeng Illog,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50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朝鮮〕權以鎮 GWON, Ijin 권이진

2001 《燕行日記》，收入林基中（編）：《燕行錄全集》，第 35 冊（서울：東國大學校出版部，2001 年）。

Yeonhaeng Ilgi, in Gi-jung Im (ed.), *Yeonhaenglog Jeonjib*, Vol. 35 (Seoul: Dongguk University Press, 2001).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 GUKSA Pyeonchan Wiwonhoe (eds.)

1957a 《肅宗實錄》，收入《朝鮮王朝實錄》，第 38 冊（서울：東國文化社，1957 年）。

Sukjong Sillog, in *Joseon Wangjo Sillog*, Vol. 38 (Seoul: Dongguk Inmunhwasa, 1957).

1957b 《英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43 冊（서울：東國文化社，1957 年）。

Yeongjo Sillog, in *Joseon Wangjo Sillog*, Vol. 43 (Seoul: Dongguk Inmunhwasa, 1957).

1958 《正祖實錄》，《朝鮮王朝實錄》，第 45 冊（서울：東國文化社，1958 年）。

Jeongjo Sillog, in *Joseon Wangjo Sillog*, Vol. 45 (Seoul: Dongguk Inmunhwasa, 1958).

1969 《承政院日記》（서울：國史編纂委員會，1969 年）。

Seungjeongwon Ilgi (Seoul: Guksa Pyeonchan Wiwonhoe, 1969).

近人文獻

中國古典文學會（主編） ZHONGGUO Gudian Wenxuehui (eds.)

1989 《域外漢文小說論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年）。

Yuwai Hanwen Xiaoshuo Lunjiu (Taipei: Taiwan Xueshengshuju, 1989).

王宇 WANG, Yu

2014 〈路康樂著作《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828）》評介兼論晚清滿漢關係史研究〉，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第 11 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 年），頁 444-456。

“Lukangle Zhuzuo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Pingjie Jianlun Wanqing Manhan Guanxishi Yanjiu,” in Wenying Qi (ed.), *Minzushi Yanjiu*, Vol. 11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14), pp. 444-456.

王成勉 WANG, Chen-main

- 2006 〈沒有交集的對話——論近年來學界對「滿族漢化」之爭議〉，收入汪榮祖、林冠群（編）：《胡人漢化與漢人胡化》（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6年），頁57-81。

“Meiyou Jiaoji de Duihua: Lun Jinnianlai Xuejie dui ‘Manzu Hanhua’ zhi Zhengyi,” in Rong-zu Wang & Kuan-chun Lin (eds.), *Huren Hanhua yu Hanren Huhua* (Chiayi: Guoli Chongcheng Daxue Taiwan Renwen Yanjiu Zhongxin, 2006), pp. 57-81.

王汎森 WANG, Fan-sen

- 2013 《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3年）。

Quanli de Maoxiguan Zuoyong: Qingdai de Sixiang Xueshu yu Xintai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3).

王桂東 WANG, Guidong

- 2014 〈《熱河日記》與清代民族問題研究二題〉，收入奇文瑛（主編）：《民族史研究》，第11輯（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24-247。

“Rehe Riji yu Qingdai Minzu Wenti Yanjiu Erti,” in Wenying Qi (ed.), *Minzushi Yanjiu*, Vol. 11 (Beijing: Zhongyang Minzu Daxue Chubanshe, 2014), pp. 224-247.

王維佳 WANG, Weijia

- 2015 〈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之編纂與價值〉，《史學月刊》，第6期（2015年6月），頁15-24。

“Wu Han Chaoxian Lizhao Shilu zhong de Zhongguo Shiliao zhi Bianzuan yu Jiazhi,” *Shixue Yuekan*, No. 6 (June, 2015), pp. 15-24.

夫馬進 FUMA, Susumu

- 2015 《朝鮮燕行使と朝鮮通信使》（名古屋：名古屋大學出版會，2015年）。

Chōsen Enkoushi to Chōsen Tsūshinshi (Nagoya: Nagoyadaigaku Shuppankai, 2015).

米華健 MILLWARD, James A.

- 2017 《嘉峪關外：1759-1864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賈建飛（譯）（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年）。

Jiayuguan Wai: 1759-1864 Nian Xinjiang de Jingji, Minzu he Qing diguo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Jianfei Jia (trans.) (Hong Ko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7).

何新華 HE, Xinhua

- 2016 《清代朝貢文書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6年）。
Qingdai Chaogong Wenshu Yanjiu (Guangzhou: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2016).

吳元豐 WU, Yuanfeng

- 1997 〈清代內閣滿文檔案述略〉，《滿語研究》，第1期（1997年5月），頁55-61。
“Qingdai Neige Manwen Dangan Shulüe,” *Manyu Yanjiu*, No. 1 (May, 1997), pp. 55-61.

吳湘湘 WU, Xiang-xiang

- 1955 〈李朝實錄對於明清史研究之貢獻〉，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頁151-185。
“Lizhaoshilu Duiyu Mingqingshi Yanjiu zhi Gongxian,” in *Zhonghua Xueshuyuan Hanguo Yanjiusuo* (eds.), *Zhonghan Wenhua Lunji*, Vol. 1 (Taipei: Zhonghua Wenhua Chuban Shiye Weiyuanhui, 1955), pp. 151-185.

吳紹欽 WU, Shaoqiu

- 1984 〈《熱河日記》與滿族民俗〉，《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1984年7月），頁106-115。
“Rehe Riji yu Manzu Minsu,” *Yanbi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ban)*, No. 2 (July, 1984), pp. 106-115.

李花子 LI, Huazi

- 2006 《清朝與朝鮮關係史研究——以越境交涉為中心》（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2006年）。
Qingzhao yu Chaoxian Guanxishi Yanjiu: yi Yuejing Jiaoshe wei Zhongxin (Yanji: Yanbian Daixue Chubanshe, 2006).

李光濤 LI, Kuang-tao

- 1955 〈記李氏朝鮮實錄〉，收入中華學術院韓國研究所（編）：《中韓文化論集（一）》（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5年），頁137-150。
“Ji Lishi Chaoxian Shilu,” in *Zhonghua Xueshuyuan Hanguo Yanjiusuo* (eds.), *Zhonghan Wenhua Lunji*, Vol. 1 (Taipei: Zhonghua Wenhua Chuban Shiye Weiyuanhui, 1955), pp. 137-150.
- 1970 《多爾袞徵女朝鮮史事》（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0年）。
Duoergun Zhengnü Chaoxian Shishi (Taipei: Zhongyang Yanjiu 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1970).

- 汪銀峰、姚曉娟 WANG, Yinfeng & YAO, Xiaojuan
 2014 〈朝鮮朝燕行使筆下的滿語〉，《滿語研究》，第2期（2014年12月），頁24-28。
 “Chaoxianzhao Yanxingshi Bixia de Manyu,” *Manyu Yanjiu*, No. 2 (Dec., 2014), pp. 24-28.
- 杉山清彥 SUGIYAMA, Kiyohiko
 2008 〈大清帝国史研究の現在——日本における概況と展望——〉，《東洋文化研究》，第10號（2008年3月），頁347-372。
 “Taisei Teikokushi kenkyū no Genzai: Nihon niokeru Gaikyō to Tenbō,” *Tōyō Bunka Kenkyū*, No. 10 (Mar., 2008), pp. 347-372.
- 李元淳 YI, Won-sun 이원순
 1993 〈赴京使行의 文化史的意義〉，《朝鮮時代史論集：안(한국) 과박(세계) 의만남의역사》（서울：느티나무，1993年），頁53-74。
 “Bugyeongsaheeng ui Munhwasajeog Uiui,” in *Joseon Sidaesa Lonjib: An (Hangug) Gwabakk (Segye) Uimannam Uiyeogsa* (Seoul: Neutinamu, 1993), pp. 53-74.
- 孟森 MENG, Sen
 2006a 《明史講義》（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Mingshi Jiangy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6).
 2006b 《明清史論著集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Mingqingshi Lunzhu Jik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06).
- 林基中 IM, Gi-jung 임기중
 2015 〈燕行歌辭와 燕行錄의 相互原典성과 流行樣式〉，收入林基中、崔韶子（編），《연행록의 세계》（서울：景仁文化社，2015年），頁1-42。
 “Yeonhaeng Gasa wa Yeonhaenglog ui Sanghowonjeonseong gwa Yuhaeng Yangsig,” in Gi-jung Im & So-ja Choi (eds.), *Yeonhaenglog ui Segye* (Seoul: Gyeong Inmunhwasa, 2015), pp. 1-42.
- 林士鉉 LIN, Shi-xuan
 2016 〈統攝百辟：旗人與清代內閣及其文書〉，收入旗人與國家制度工作坊（編）：《「參漢酌金」的再思考：清朝旗人與國家制度》（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16年），頁25-82。
 “Tongshe Baibi: Qiren yu Qingdai Neige ji qi Wenshu,” in Qiren yu Guojiazhidu Gongzuofang (eds.), *‘Canhan Zhuojin’ de Zaisikao: Qingchao Qiren yu Guojia Zhidu*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2016), pp. 25-82.

邱瑞中 QIU, Ruizhong

- 2010 《燕行錄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Yanxinglu Yanjiu (Guilin: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10).

岡田英弘（編） OKADA, Hidehiro (ed.)

- 2009 《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年）。
Shinchō towa Nanika (Tokyo: Fujiwara Shoten, 2009).

金玲竹 GIM, Yeong-jug 김영죽

- 2017 〈연행 體驗 기록의 慣行과 그 매커니즘〉，《漢文古典研究》，第34卷（2017年6月），頁265-304。
“The Practice of Yeonhang(燕行) Experience Record and Its Mechanism,” *Journal of Korea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Vol. 34 (June, 2017), pp. 265-304.

金泰俊 GIM, Tae-jun 김태준

- 1987 《洪大容評傳》（서울：民音社，1987年）。
The Life and Work of Hong Taeyong (Seoul: Minumsa, 1987).
1988 《虚学から実学へ——18世紀朝鮮知識人洪大容の北京旅行》
（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8年）。
Kyogaku kara Jitsugaku e: 18 Seiki Chōsen Chishikijin Hong Taeyong no Peking Ryokō (Tokyo: Tokyodaigaku Shuppankai, 1988).

金榮鎮 GIM, Yeong-jin 김영진

- 2011 〈燕行錄의 체계적 정리 및 연구 방법에 대한 試論〉，《大東漢文學》，第34輯（2011年），頁65-91。
“Research about Yeonhaengnok (燕行錄)’s systematic arrangement and method of study,” *Daedong Hanmunhag*, Vol. 34 (2011), pp. 65-91.

姜在彥 GANG, Jae-eon 강재언

- 2001 《朝鮮儒教の二千年》（東京：朝日新聞社，2001年）。
Chōsen Jukyō no Nisennen (Tokyo: Asahi Shinbunsha, 2001).

柯嬌燕 CROSSLEY, Pamela Kyle

- 2016 《孤軍：滿人一家三代與清帝國的終結》，陳兆肆、董建中（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
Gujun: Manren Yijia Sandai yu Qingdiguo de Zhongjie [Orphan Warriors: Three Manchu Gener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Qing World], Zhaosi Chen & Jianzhong Dong (trans.) (Beijing: Renmin Chubanshe, 2016).

夏曉虹 XIA, Xiaohong

- 2004 《晚清女性與近代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

年)。

Wanqing Nüxing yu Jindai Zhongguo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2004).

孫衛國 SUN, Weiguo

2009 《明清時期中國史學對朝鮮的影響：兼論兩國學術交流與海外漢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9年）。

On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Choson Korea during Ming-Qing Period: with Attached Papers on the Sino-Korea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and the Chinese Studies Abroad (Shanghai: Shanghai Lexicographical Publishing House, 2009).

2018 《從「尊明」到「奉清」：朝鮮王朝對清意識的嬗變（1627-191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8年）。

From "Honoring the Ming" to "Submitting to the Q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osŏn Korea's Attitude towards Qing China, 1627-1910 (Taipei: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徐凱 XU, Kai

1998 〈朝鮮佐領考〉，《韓國學論文集》，第7期（1998年9月），頁313-319。

"Chaoxian Zuoling Kao," *Hanguoxue Lunwenji*, No. 7 (Sep., 1998), pp. 313-319.

2000 〈八旗滿洲旗分佐領內高麗姓氏〉，《故宮博物院院刊》，第5期（2000年10月），頁62-73。

"Baqi Manzhou Qifenzuoling nei Gaolixingshi," *Palace Museum Journal*, No. 5 (Oct., 2000), pp. 62-73.

徐東日 XU, Dongri

2011 〈試論朝鮮朝燕行使臣眼中的滿族人形象〉，《東疆學刊》，第28卷第4期（2011年10月），頁1-8。

"Shilun Chaoxianchao Yanxingshichen Yanzhong de Manzuren Xingxiang," *Dongjiang Journal*, Vol. 28, No. 4 (Oct., 2011), pp. 1-8.

張存武 CHANG, Cun-wu

1967 〈介紹一部中韓關係新史料——《燕行錄選集》〉，《思與言》，第4卷第5期（1967年），41-42。

"Jieshao Yibu Zhonghan Guanxi Xinshiliao: Yanxingluxuanji," *Si yu Yan [Thought And Words]*, Vol. 4, No. 5 (1967), pp. 41-42.

張存武、葉泉宏（編） CHANG, Cun-wu & YE, Quan-hong (eds.)

2000 《清入關前與朝鮮往來國書彙編 1619-1643》（臺北：國史館，2000年）。

Qing Ruguanqian yu Chaoxian Wanglai Guoshu Huibian 1619-

1643 (Taipei: Guoshi Guan, 2000).

張伯偉 ZHANG, Bowei

2016 〈名稱·文獻·方法——關於「燕行錄」研究的若干問題〉，收入氏（編）：《「燕行錄」研究論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16年），頁3-26。

“Mingcheng, Wenxian, Fangfa: Guanyu ‘Yanxinglu’ Yanjiu de Ruogan Wenti,” in Bowei Zhang (ed.), *‘Yanxinglu’ Yanjiu Lunji* (Nanjing: Feng Huang Chubanshe, 2016), pp. 3-26.

2017 《東亞漢文學研究的方法與實踐》（北京：中華書局，2017年）。

Dongya Hanwenxue Yanjiu de Fangfa yu Shijian [Methodologies and Practices of the Study on East Asian Sinographic Literature]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7).

陳捷先 CHEN, Jie-xian

1996 〈清太祖時期滿洲與朝鮮關係考〉，收入刁書仁、衣興國（編）：《中朝關係史研究論文集》（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年），頁274-298。

“Qingtaizu Shiqi Manzhou yu Chaoxian Guanxi Kao,” in Shuren Diao & Xingguo Yi (eds.), *Zhongchao Guanxishi Yanjiu Lunwenji* (Changchun: Jilin Wenshi Chubanshe, 1996), pp. 274-298.

鹿智鈞 LU, Zhi-jun

2017 《根本與世僕：清朝旗人的法律地位》（臺北：秀威資訊，2017年）。

Genben yu Shipu: Qingchao Qiren de Falü Diwei (Taipei: Showwe Zixun, 2017).

崔韶子 CHOE, So-ja 최소자

2008 〈「燕行錄」연구를 위한 제언〉，《명칭사연구》，第30輯（2008年10月），頁1-11。

“‘Yeonhaengnok’ Yeonguleul Wihan Jeeon,” *Myeongcheongsa Yeongu*, Vol. 30 (Oct., 2008), pp. 1-11.

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 INSTITUTE for Advanced Humanistic Studies at Fudan University (eds.)

2009 《從周邊看中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年）。

Cong Zhoubian kan Zhongguo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9).

黃元九 HWANG, Won-gu 황원구

2001 〈연행록 연구의 과제〉，《한국문학연구》，第24輯（2001年12月），頁9-10。

“Yeonhaenglog Yeonguui Gwaje,” *Hanguk Munhag Yeongu*, Vol. 24

(Dec., 2001), pp. 9-10.

黃麗君 HUANG, Li-jun

2019 〈八旗制度與族群認同：清前期中朝關係史中的內務府高麗佐領金氏家族〉，《清史研究》，第2期（2019年5月），頁64-77。

“The Jin Family and Their Ethnic Ident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no-Joseon Studies,” *The Qing History Journal*, No. 2 (May, 2019), pp. 64-77.

葉高樹 YEH, Kao-shu

2009 《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9年）。

Qingchao Qianqi de Wenhua Zhengce (Taipei: Daw Shiang Chubanshe, 2009).

2010 〈「滿族漢化」研究上的幾個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0期（2010年12月），頁195-218。

“Several Questions on the Study of Manchu Sinicizatio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No. 70 (Dec., 2010), pp. 195-218.

2012 〈清朝的旗學與旗人的翻譯教育〉，《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2年12月），頁71-154。

“The School System and Translation Education of the Bannermen in the Ch’ing Dynasty,”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8 (Dec., 2012), pp. 71-154.

2013 〈清朝的繙譯科考制度〉，《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49期（2013年6月），頁47-136。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on Translation in Ch’ing Dynasty,”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o. 49 (June, 2013), pp. 47-136.

2014a 〈清朝統治中國成功的代價——以八旗子弟的教育為例〉，收入汪榮祖（編）：《清帝國性質的再商榷：回應新清史》（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14年），頁133-163。

“Qingchao Tongzhi Zhongguo Chenggong de Daijia: yi Baqi Zidi de Jiaoyu Weili,” in Jung-tzu Wang (ed.), *Qingdiguo Xingzhi de Zaishangque: Huiying Xinqingshi* (Taipei: Yuanliu Chuban Gongsi, 2014), pp. 133-163.

2014b 〈繙譯考試與清朝旗人的入仕選擇〉，《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52期（2014年12月），頁95-132。

“Imperial Translation Examinations and the Way to Governmental Officials of the Bannermen in the Ch’ing Dynasty,” *Bulletin of Historical Research*, No. 52 (Dec., 2014), pp. 95-132.

2018 〈清初諸帝統治「中國」的危機意識〉，收入朱鴻、林麗月等

(編)：《明清政治與社會：紀念王家儉教授論集》(臺北：秀威資訊，2018年)，頁99-149。

“Qingchu Zhudi Tongzhi ‘Zhongguo’ de Weiji Yishi,” in Hung Chu & Li-yueh Lin et al (eds.), *Mingqing Zhengzhi yu Shehui: Jinian Wang Jia-jian Jiaoshou Lunji* (Taipei: Showwe Zixun, 2018), pp. 99-149.

廈門大學民間歷史文獻研究中心 CENTER for Research on Local Historical Documents, Xiamen University

2019 「海洋與中國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演講集萃(三)：
<https://crlhd.xmu.edu.cn/2019/0412/c11776a366577/page.htm>，檢
 索時間：2019年8月16日。

葛兆光 GE, Zhaoguang

2008 〈攬鏡自鑒——關於朝鮮、日本文獻中的近世中國史料及其他〉，《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2008年3月)，頁2-9。

“Mirror for Self-recognition: Reflections on the Japanese and Korean Literatures on Chinese History,” *Fudan Journal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No. 2 (Mar., 2008), pp. 2-9.

2014 〈文化間的比賽：朝鮮赴日通信使文獻的意義〉，《中華文史論叢》，第2期(2014年6月)，頁1-62。

“Contest among Cultures: Significance of the Records of Joseon Missions to Japan,”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No. 2 (June, 2014), pp. 1-62.

路康樂 RHOADS, Edward J. M.

2010 《滿與漢：清末民初的族群關係與政治權力(1861-1928)》，王琴、劉潤堂(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

Manchus and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Qin Wang & Runtang Liu (trans.)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2010).

漆永祥 QI, Yongxiang

2010 〈關於「燕行錄」界定及收錄範圍之我見〉，《古籍整理研究學刊》，第5期(2010年9月)，頁60-65。

“Discussion on ‘Yan Xing Lu’s’ Definition and Its Compilation Range from My Point,” *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 5 (Sep., 2010), pp. 60-65.

2011 〈關於「燕行錄」整理與研究諸問題之我見〉，收入張伯偉(編)：《域外漢籍研究集刊》，第7輯(北京：中華書局，

2011年），頁37-66。

“Guanyu ‘Yan Xing Lu’ Zhengli yu Yanjiu Zhuwen tizhiwojian,” in Bowei Zhang (ed.), *Yuwai Hanji Yanjiu Jikan*, Vol. 7 (Beijing: Zhonghua Shuju, 2011), pp. 37-66.

劉小萌 LIU, Xiaomeng

2013 〈旗籍朝鮮人安氏的家世與家事〉，《清史研究》，第4期（2013年11月），頁1-19。

“The Family History and Deeds of Banner & Korean People of Surname An,” *Studies in Qing History*, No. 4 (Nov., 2013), pp. 1-19.

劉家駒 LIU, Jia-ju

1986 《清朝初期的中韓關係》（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

Qingchao Chuqi de Zhonghan Guanxi (Taipei: Wenshizhe Chubanshe, 1986).

裴英姬 BAE, Young-hee 배영희

2009 〈《燕行錄》的研究史回顧（1933-2008）〉，《臺大歷史學報》，第43期（2009年6月），頁219-255。

“History of the Yeon Haeng Rok: A Review Article,” *Historical Inquiry*, No. 43 (June, 2009), pp. 219-255.

鄭惠仲 JEONG, Hye-jung 정혜중

2015 〈18세기 조선지식인의 청국 여성관 — 김창업（金昌業）과 박지원（朴趾源）의 기록을 중심으로 —〉，《중국학보》，第73卷（2015年），頁377-397。

“18 Segi Joseon Jisig Inui Cheonggug Yeoseongwan: Kim Chang-up gwa Park Chi-won ui Gilogeul Jungsimeulo,” *Junggug Hagbo*, Vol. 73 (2015), pp. 377-397.

歐立德 ELLIOTT, Mark C.

2006 〈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第24卷第2期（2006年冬季號），頁1-18。

“Manchu-language Archives and the New Ch’ing History,” *The National Palace Museum Research Quarterly*, Vol. 24, No. 2 (Winter, 2006), pp. 1-18.

盧正恆、黃一農 LU, Zheng-huan & HUANG, Yi-nong

2014 〈先清時期國號新考〉，《文史哲》，第1期（2014年1月），頁66-74。

“New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Dynastic Name of Qing, 1616-1636,”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No. 1 (Jan., 2014), pp. 66-74.

CHOE, Yong-chul 崔溶澈 최영철

2012 “Manchu Studies in Korea,” *Journal of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East Asia*, Vol. 3 (Mar., 2012), pp. 89-101.

CROSSLEY, Pamela Kyle 柯嬌燕

1999 *A Translucent Mirror: 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ELLIOTT, Mark C. 歐立德

2001 *The Manchu Way: 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